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2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一、外国学者论中国先秦哲学

中国哲学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博大精深著称于世，尤其是具有早熟的特征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中国哲学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哲人。

中国先秦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在夏殷时期哲学思想开始萌芽，反映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礼”已经产生。到了西周末年，由于社会动荡，产生了怨天尤人思想，同时阴阳五行思想得到发展。秦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在意识领域里，出现了群星灿烂的“诸子百家”和错综复杂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儒家强调：“与命与仁”，同时提出“叩其两端”；道家主张“道”生万物，同时强调“反者道之动”；墨家强调实践，名家研究名与实、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阴阳家提出了金木水火土之间相生相克，构成正在变化着的世界……，各家之间相争过程中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形成了我国先秦哲学特有的风貌。

中国的学者对先秦哲学研究得非常深入，力求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不少外国学者，特别是一些著名的哲学家，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中国先秦哲学也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如德国的莱布尼茨和黑格尔、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汤普生、朝鲜的郑振锡和崔凤益等。了解他们对中国先秦哲学的褒贬可否，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莱布尼茨论中国先秦哲学

莱布尼茨（1646-1716）是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与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数理逻辑的先驱者。曾任柏林皇家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提出了他认为是和中国“先天八卦”相吻合的二进制。他又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其唯心主义体系中，含有辩证法因素。主要著作有《单子论》、《人类理解力新论》、《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一文对中国哲学给以了一定的评价。

莱布尼茨有位法国朋友叫德雷蒙，他曾寄给莱布尼茨西方哲学家评价中国哲学的书籍。莱布尼茨不同意西方一些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于是写了这封信寄给德雷蒙。《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主要是针对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的《论中国人的宗教》一书而写的。在这封信中，莱布尼茨反复分析“上帝”、“鬼神”、“天”等概念，并对《易经》进行了评价。

莱布尼茨谈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上帝”和“鬼神”。

莱布尼茨生活的时代，正当中国清朝早期，那时有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并把中国有关哲学、道德等一系经籍介绍到欧洲，以致欧洲各国掀起了“中国热”。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强调西方宗教的优越地位，指出西方宗教具有神启的特点，而中国传统则根据缺乏启示的概念，一向是以无神论为主的，是和西方宗教站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上的。另派却认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尤其是儒家经典表现的古代宗教——也是敬神的，虽然没有“启示”，但可算作自然宗教。这派人士比较尊重中国文化，莱布尼茨也同意这种看法。莱布尼茨认为“首先值得怀疑的是中国人是否承认或者已经承认了精神实体，尽管他们也许不认为精神实体是可以同物质分开来并且完全在物质以外的。对于被[上帝]创造的精神来说，这倒没有什么坏

处。……但是，至于上帝，中国人的看法很可能是也给他一个肉体，并且把他看做是世界的灵魂，就象古希腊和欧洲的哲学上所说的那样。”

关于上帝的问题，也表现在对中国宋明理学中“理”的理解上。莱布尼茨和龙华民都认为“理”是中国哲学最高层次的概念，是尽善尽美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本位，具有最大的完满性、无限性和永恒性。用莱布尼茨的话说，理“是一种久恒相等的动”，“以天地绝对主宰的身份统治一切”。但龙华民认为“理”不是上帝，因而“理不能自存，它需要上帝”却没有脱离物质故不是精神实体。而且“理本身无生命、无主张、无明智”即无人格所以不是上帝。而莱布尼茨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把上帝理解为非人格的最高原因，上帝本身也是一个单子。既然中国人已经赋予以最高的完满性，而且理只能通过“原始物质”（元气）产生万物，恰好证明了理不是物质而是至高无上的“道”、“正”、“纯”，那么是否具有“人格”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于《论语》中曾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怪”、“力”、“乱”、“神”这四种东西，孔子什么话都不说，说明孔子对鬼神抱着一种回避和存疑态度。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相对地削弱了天命鬼神对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龙华民神父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莱布尼茨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位神父也由此得出了结论，孔子自己有一些不好的主张，这差不多随处都可以得到证明，这位神父也说如此，显然古代的中国人也和近代的中国人一样，都是无神论者，而我认为，孔子这种方法败坏了人们的心，蒙昧了中国儒家的精神，迫使儒家们只想到可见的，可感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陷落到一切坏事中最大的坏事——无神论中去了。我相信孔子这种‘不语’的方法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本来最好是应该进一步加以解释，……按照孔子这种方法，他远不是否认鬼神和宗教，他仅仅是想要人们不要争辩这些事情，要人们满足于知道‘上帝’和鬼神的存在和作用，要他们敬‘上帝’和鬼神，尊行德性以取悦于‘上帝’和鬼神，不要深究他们的性质，不要问为什么或者追寻他们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不管说什么话来反对古代中国人都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易学哲学给以高度评价。

莱布尼茨和白晋共同发现了中国《易经》卦爻的二进制制的排列问题。1698年白晋以阴爻（--）代表0，以阳爻（—）代表1，可以把六十四卦爻排列成相应的数字，这个发现引起了莱布尼茨的注意。1701年4月，莱布尼茨将自己发现的二进制列成一个表送给白晋，这时白晋发现的《易经》卦爻的二进位才被确认。该年11月白晋送给莱布尼茨两个易图，一个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另一个是《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进行了悉心研究，充分肯定了《易经》卦爻二进制排列的科学性。他说：“我们欧洲人如果对于中国文学有足够的知识，那么加上逻辑、评论、数学，以及我们的比他们更准确的表达方式，会使我们在如此古老的中国记载中发现比中国近代中国人甚至以及他们后来的注释家们……知道得更多的东西。”“这个帝国的奠基人伏羲的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断线组合而成的……是最简单的，一共有64个图形，包含在名为《易经》的书中。《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5个世

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 64 个图形中寻找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人达到了最完满的道德标准），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近代人。”

莱布尼茨从 20 多岁起就研究中国哲学，直到逝世，他终身爱好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他对《尚书》、《周易》、《大学》、《中庸》等著作都有所涉猎，他对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深刻的思想惊叹不已。“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自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他对那些轻蔑中国哲学的欧洲学者毫不留情地大声呵斥说：“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遍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并较为推崇的。但由于当时莱布尼茨所掌握的材料有限，又由于他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因此他在评价中国哲学时对中国哲学中的一些基本范畴、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和混乱。

（二）黑格尔论中国先秦哲学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曾任柏林大学的校长。黑格尔的哲学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又怯懦的阶级特点。他的体系是保守的，而他却“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个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因而其辩证方法本质上是革命的。但在他的哲学中，存在着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最终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辩证法的革命精神。

黑格尔一生有许多著作，其中《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和《哲学全书》等最有影响。但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论述不多，其中在米希勒编辑的黑格尔全集里，3 大卷《哲学史讲演录》，长达 1700 页，但论到中国哲学的仅占 6 页，只提到了孔子、《易经》和道家。但黑格尔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古老的。”

黑格尔认为，孔子哲学是一个道德哲学。

黑格尔认为，孔子是中国主要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传到欧洲之后，“在莱布尼茨时代曾轰动一时”。这种道德学说也曾“受到哪些熟悉基督教道德的人们最大的称颂和对它的优越性的承认”。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3 页。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61 页。

《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 卷第 119 页。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12 页。

中肯定了孔子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孔子的道德教训也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但黑格尔运用大量的笔墨说明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思辨的哲学。“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所谓的思辨哲学不过是指以抽象概念为对象，并从中演绎出一切客观存在的唯心主义哲学。因此，黑格尔认为孔子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而是中国人的教育、文化和从事实际活动的原则和规定。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孔子哲学只是“一桩政治的事务”，“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他举了孔子宣扬的一套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理纲常，黑格尔也承认这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

对于孔子哲学中“天”的观念，黑格尔认为，“天命”则是冥冥中操纵一切的主宰者，因此个体对“天”的关系也是被理解为掩埋在普遍性里面，“本身既不能有任何价值，也无法获得任何价值。”黑格尔说，这种宗教不同于罗马、希腊宗教，不同于基督教，因为希腊的神，犹太人的基督“都是明显的人格化的形象”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哲学，但却不是真正的宗教。

对于孔子最主要著作《论语》，黑格尔持蔑视态度。其实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适应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孔子学说虽不是形而上学的玄思，但却是一种具有可践履性的实践哲学，融世界观，人生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为一体。而且还有逻辑学、美学以及教育方面的内容，这是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的。

黑格尔认为《易经》具有抽象思维的特征。

黑格尔说《易经》的出现，说明“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这里指《易经》中的符号、图形的运用及其含意的规定，超越了感性的阶段。在黑格尔看来，感性的认识和表达，只着眼于个别的、转瞬即逝的具体事物，不能对事物的本质和根源作出说明，不能作为哲学的开端和研究哲学的适当方式。

黑格尔在谈到“阴阳八卦”时说：“这些直线是一种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人说那些直线是他们文字的基础，也是他们哲学的基础。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但黑格尔指出，“这虽然达到了纯粹思想意识，但并不深入”。八卦只“表示出一种对自然事物加以分类的努力”。并没有内在的秩序；把天、雷、风、山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这种分类的方式也是不适合的。黑格尔还认为，《易经》被作为卜筮之用，这是把外在的偶然的東西与最内在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加以对比，所以《易经》这种哲学最后就流入空虚。

黑格尔说：“老子的著作也是很受中国人尊敬的。”

黑格尔认为孔子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易经》哲学虽然达到了对于纯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19页。

《历史哲学》第112页。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17页。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粹思想意识，但并不深入。而道家哲学由于它的主要概念“道”就是“理性”，所以“也有点象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

黑格尔指出道家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特异的宗派，以思辨为特性。他对这家的论述采取大段大段的引文的办法，不同于对孔子和《易经》的论述。黑格尔认为“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基础”。

“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生之本，万物之源。”黑格尔对于《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一”、“二”、“三”之德于“道”。但黑格尔对《道德经》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却只字未提。

黑格尔对《道德经》中的主要概念“无”给以较高评价。他引雷缪萨的话说：“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做的本质。”

由此看来，黑格尔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对中国先秦哲学的看法是主观的，片面的，他对孔子、《易经》和道家的一些论述是十分简单的肤浅的，而且不乏歪曲。

（三）郑振锡、崔凤益论中国先秦哲学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哲学上、阴阳、五行和儒道等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对朝鲜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同朝鲜原有的哲学思想结合，构成了朝鲜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

由朝鲜著名的学者郑振锡、郑圣哲、金昌元合著的《朝鲜哲学史》（朝鲜科学院 1962 年出版）和由崔凤益执笔编辑的《朝鲜哲学思想史研究》（古代——近代）朝鲜社会科学院 1975 年出版）这两部书，其中不少部分对中国先秦哲学进行了评价。

关于阴阳、五行思想

西周末年由于社会动荡，周太史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和“阴阳之序”的观点，同时“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形成。郑振锡认为，古朝鲜时期，贵族奴隶主“从中国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中的宗教迷信的政治观点。阴阳五行思想本来是在中国产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的哲学思潮。但是到了汉代，由于唯心主义哲学家加进了神秘主义的宗教内容，使它的社会政治观，变成为剥削阶级统治服务的理论”。

“构成世界的最初元素有土、木、金、火、水等五种物质。气是这五种元素的基础，气又分为阴气和阳气。气是细微的，像空气一样的物质。阴气是消极的、阴暗的气，阳气是积极的、明亮的气。这两种气的对立斗争产生了五行这五种物质元素，这五种元素的结合产生了天地万物。这既是朴素的唯物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第 127128 页。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第 126 页。

《历史哲学》和 179 页。

《朝鲜哲学史》第 2 页。

主义，又是自发的辩证法。阴阳五行思想中虽然包含着这种唯物主义观点，但在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时却宣扬五德终始的思想，这是极其神秘的宗教观点。阴阳五行思想认为五行在自然界中是相互转化的，转化的顺序是由土及木、由木及金、由金及火、由火及水。封建王朝也按此法则循环，每一个王朝都是以天赋于这五种物质的德，命中注定为王的，也就是说，某一王朝是以土德，另一王朝是以木德，或以金德、火德、水德等，以五种德中的一种为王的。”

在论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朝鲜哲学史》说，古朝鲜的进步阶级，从阴阳、五行思想中吸取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反对以往崇拜天命的儒教及其他反动思潮。贵族奴隶主阶级，则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形成古代朝鲜的重要的反动思潮。

崔凤益认为，“气”范畴的产生，意味着哲学思维发展的一大进步。有关“气”的思想奠定了朝鲜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曾对中世纪朝鲜哲学史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

关于儒家思想

对于儒家思想，郑振锡等人认为，儒教哲学中的天是具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者，天创造世界，天的法则就是事物运动的法则。其目的就在于把剥削阶级制度解释成符合永恒不变的天法则，从而把剥削制度绝对化。儒教哲学中的仁是人类应具有的最高道德范畴，是认识封建社会秩序——礼的先天能力。儒教哲学的认识论，虽然强调了先天的认识能力，但也包含着强调人类经验和实践活动的积极因素。

崔凤益在他的《朝鲜哲学思想史研究》一书中则认为，盲目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天，是儒教思想、儒教哲学的宗教思想基础。应从三个方面对儒教进行批判：一、儒教宣扬的天是超自然的宇宙神，天命是宇宙神的意志和意愿，这是宗教宿命论的世界观。它的目的在于压抑人的自主意识和斗争意识，把人们变成无条件服从统治阶级的奴隶。二、儒教极力宣扬忠、孝思想，企图使封建王权神圣化、封建统治秩序和家长制合法化。三、儒教以孝为基础理念的三纲五常，毒害了朝鲜人民的健康的道德生活。

关于道家思想

道家是以主张“道”生万物而闻名于世的学派，它的创始人是老聃，其代表作为《老子》。道家提出了“道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说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法思想。

郑振锡等人认为，老子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于中国，后传入朝鲜，到了朝鲜三国时期，老子的思想已广为流传。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它主张世界是由物质和气构成，气按道的规律运动。这是反对天意、神意创造世界的思想。老子哲学中还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它认为事物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运动又是对立物的转化。它还从道的学说推导自然无为的社会政治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人民生活中的罪恶和不幸，是由于执政者过于违背道的自然法则和干涉个人生活造成的。老子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唤起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而是号召人们回复到原始生活方式。这就是它的社会政治观的局限性。老子的哲学“尽管有上述局限性，但在朝鲜哲学史上却成为反对唯心主义哲

学的主要唯物主义思潮之一”。

(四) 雅斯贝尔斯论中国先秦哲学

K·雅斯贝尔斯是德国现代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海德堡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哲学教授，后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雅斯贝尔斯称他的哲学为“生存哲学”；但它不是关于“生存”的知识，而是一种生活动或生存方式。其著作有《哲学》、《理性和生存》、《生存主义》、《论真理》等。他在著作中多处论及中国哲学。

关于孔子的“仁”

孔子是儒家哲学的创始人，中国哲学的杰出代表，但孔子不是要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体系，而是具有可践履性的人学哲学，其体系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体系，带有明显的现世态度、入世倾向。雅斯贝尔斯指出：孔子“很少注意那些创制舟车、犁耙的古代发明家，如伏羲、神农、黄帝。真正的历史开始于那些社会、政府、伦理和秩序的缔造者。在历史的源头屹立着的是尧、舜、禹的理想形象：他们体现了上天的永恒原型。”雅斯贝尔斯说，孔子生活在“王朝崩溃，社会动乱的时代”，“试图通过游说”，借助于教育和知识，“来拯救社会”。孔子着力宣传他的“仁”的思想。

雅斯贝尔斯是这样理解和介绍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

人的本质为仁。仁是人性和道德的合一。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解答首先在于阐明人是什么和应该成为什么；其次是说明他的存在的多样性。首先，人必须成为人，人不同于动物。人能积极地改变他的生活，并超越本能，将其建立在人的道德责任上。仁是一切善行的前提。只有仁人才能真正爱人和恨人。

仁无所不包，它不是一种品格，而是所有品格的灵魂。仁是包罗一切的源泉，是一种绝对要求。但由于仁是人的本质，所以离人很近。谁欲得仁，仁就会来到他们面前。其次，人的本质表现为人的生存的多样性。在本性“仁”上相互接近，在“习惯”上，在个性、年龄、知识和发展程度上相互区别。（1）年岁之不同。“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争。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2）人的类型。孔子区分了4种类型和层次的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

雅斯贝尔斯在谈论“仁”作为人的本质的规定时，没有充分注意孔子之“仁”在道德践履、个人修养上的意义；而年岁之不同的问题，孔子是强调人们在行“仁”的过程中因年龄差异而有不同侧重点；至于孔子关于4种类型人的划分，显然具有唯心主义色彩。

雅斯贝尔斯以赞同或褒奖的口吻谈论孔子，说孔子“与老子不同，他积极入世，以改变人的处境为己任。他创办学校、培养政治家。他编纂古典文献”。雅斯贝尔斯甚至说孔子是“第一个在其广度和可能性上使理性大放光芒的人物”。他指出“终极问题不是孔子的主题”，“当有人问及死亡、自

《朝鲜哲学史》第16页。

K·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转引自柳卸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
《论语·季氏》。

然和天道时，他的回答是，存而不论——不是因为有什么需要保密，而是问题本身要求这种回答。人们通常出于虚假的动机（如好奇、避世……）而提出终极问题。不仅孔子不欲满足这些欲望，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客观地谈论那些严格说来不能成为对象的东西。这就是孔子避免对任何形而上学问题作任何直接陈述的原因”。

关于老子的“道”

在中国先秦时期，道家哲学因其达到的抽象理性思维高度而为人们所称道，这一哲学派别的创始人是老子，其宇宙发生说堪与古希腊的原子论相媲美。所以，老子哲学尤其是核心范畴——道，引起雅斯贝尔斯的注意是不奇怪的。

雅斯贝尔斯指出，道是中国宇宙论的原始的基本概念，“老子接受了传统文献赋予道的内涵。这个词的原意是‘道路’，后来指世界万物的秩序，及与之相一致的人的正确行为。”而在老子那里，道是世界万物及思维者的本源和目的。雅斯贝尔斯赞叹说：“《老子》开明宗义第一句，意义深奥莫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这句话不仅反对人们匆匆忙忙地认识道而且也反对人们以认识有限事物的方式认识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如果要谈论它，那么只能采取否定的表达（因为无名，即是说，人们无法给它命名）：‘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如果你要肯定地表示它的存在，可称之为无限……如果人们要去称道它、理解它、领悟它，并从思维上分辨它或显现它的分别，它便会消失：‘复归于无物。’它的原始的完满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它的无形不同于我们能够认识的任何形状。”但是，雅斯贝尔斯指出：“这个本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而是高于存在的无，是存在的根源。”“这种非存在、无，作为万物的本源和目的，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但它是一种高于存在的存在。”

雅斯贝尔斯说，道先于天地存在，但是道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及的他者，而是当下呈现的。它虽然不可感知，但作为一切存在者中的真实存在，却是可以体验的。它出现于一切事物中，通过它，存在者获得它的存在。它存在的标志和特点是：它作为非存在而在此：虽然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触，却无处不在；它起作用，却仿佛没起作用一般，它产生了天地万物，却隐秘而不露形迹。它的作用不可抗拒，却并不显现；道对所有个别存在来说都是一源的一：一切存在者都因为一的约束而获得其存在。一作为道的创生形式，不是数字的一，而是本质的一；一切具体存在通过道获得其存在；道在善恶之外，然而其助益无穷。

雅斯贝尔斯在作了上面的分析和阐述后归纳说：道“是贯穿一切的无有，是作用一切却不露形迹的无为，是产生一切的一，是存在于善恶之外的生生灭灭的事物的根据和立足点”。可以称之为“大包”。

通观以上雅斯贝尔斯对道的理解，没有把道归结为理念、理性的意思，如果没有把道理解为完全的非存在，绝对的无的话，那么应该说他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深刻的。

从外国学者对中国先秦哲学的论述来看，有的学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

K.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见《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335—336页。

见《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338—339页。

况，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用西方的哲学和范畴来衡量中国哲学，有的得出“中国无哲学”的结论，或认为“中国哲学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伦理说教”，有的对中国先秦哲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比较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先秦哲学，认为中国先秦哲学年代久远、内容丰富、见解独特。了解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无疑有重要意义。

二、外国人心目中的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之一。中国文化因其没有中断和衰亡，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著称于世。中国古代文明长期地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文学，可谓五彩缤纷、群芳争妍，曾对东西方许多国家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伟大宝库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其劳动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听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了节奏。这种简单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始。远在二、三千年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形成，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6 世纪）大约 500 年间的 305 篇作品，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楚辞，是在公元前 4 世纪，即我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后期，继《诗经》古朴的四言诗体以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国地方的一种新诗体。它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是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屈原和楚辞的出现，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楚辞”，按其名称本义来说，是指楚地歌辞的意思，它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是屈原吸取和借鉴了楚国民间文字而创作出来的。如果拿“楚辞”来和《诗经》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其进步和进展是很明显的。如《诗经》中的诗多以四字句为定格，篇章比较短，风格比较朴素；“楚辞”就不同了，诗的结构篇幅扩大了，句式参差错落更富于变化，而且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烂。楚辞的产生，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公元 618 年，唐朝建立。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 300 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 4.8 万余首，共 900 卷。有诗人 2200 余人，较著名者约有五六十人。诗歌创作得到这样巨大的收获，这标志着唐代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新纪元。

唐代不仅有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还有王维、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达到很高的地步。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明代胡应麟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

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缙流、羽客、靡弗预矣。”这段话说明了唐诗全面发展的情况及其普及程度。

古代神话作为中华先民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可谓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对后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巨大。一方面神话中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起着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神话中的那种神奇奔放的幻想，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新奇夸张的艺术手法，都对启发后来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提高他们的艺术构思起着积极影响。例如在诗歌方面，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苏轼等的诗歌创作，便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小说方面，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以及宋元以后的许多小说，不仅接受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吸取了其中的某些素材。就是到现代，神话对于革命文学的创作仍有借鉴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已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出现了大批的作品，就其内容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如《世说新语》。

唐传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与志怪小说相比，已有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志怪小说的内容主要是记鬼神怪异之事，唐传奇虽然也是专写奇闻，但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第二，六朝的志怪故事是把怪异当成事实来记载，并不是有意识地创作小说。唐人写传奇，才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

初唐时期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的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还和六朝志怪小说相去不远，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逐渐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如王度的《古镜记》。

中唐时期作品空前增多，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从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传奇中成就最高。

晚唐时期大批传奇专集的出现表明晚唐文人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进一步重视。作品有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等。

明开国以来一百多年时间内，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恢复、发展的时期以后，开始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正因为这样，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统制文化思想的措施，就更容易收到成效。明前期文学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杰出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扩大了眼界，丰富了生活知识和斗争经验，因此在水浒、三国故事长期、广泛流传和有关的话本、杂剧刊行的基础上，写成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此后沉寂了300余年，到明中叶后，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兴盛的阶段。《西游记》首先出现，闪耀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之后出现了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接着其他长篇小说相继产生，100多年间，留下来的就有五六十部。它们的成就一般虽不高，但在我国古曲小说发展中，却有相当地位。

宋元以来兴起的小说，到清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得到了更广泛的传

播。文人独立创作的短篇和长篇小说都已十分成熟。一些优秀作家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的能力较前代有所提高，表现形式和手法更加多样化，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高峰。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二）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

东西方文化通过互相交流来加深了解，取长补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应该说是无可争辩的共识了。文化的交流有种种的渠道和方式：物质文明的自然碰撞，思想精神的相互汲取，哲人式的融会贯通，老百姓的兼收并蓄，媒体的道听途说，专家的介绍研究等等。其中专门家对异国文化和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性，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大部分是通过专门家的介绍和研究来实现的。中国古典的诗歌，从周代到“五四”运动，绵延发展了3000年。构成她全幅生命史的许多重要大段落，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极其辉煌而又互不重复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诗歌在国外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六朝编选的最早的文学总集，人们从中可以读到各家作品，因此受到封建知识分子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文选》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也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文选》的作用，首先当然在于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一首题为《论诗示王香》的诗中，曾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在日本的史籍之中，也不止一次地可以看到当时某人通《文选》之音，某人抄写《文选》之类的记载。《续日本纪》卷三十五龟九年十二月一条中还记载了天平七年（公元735年）随遣唐使来日的袁晋卿因通《尔雅》、《文选》之音而被授予大学音博士的佳话，这足以说明当时日本朝廷对《文选》尊崇的程度。在这一时期，日本诞生了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我们从这部书的汉文序言中，可以找到不少袭用《文选》的诗句，模仿《文选》中辞赋写法的例证。象《万叶集》卷十七（3974）大伴池主所作《七言晚春三日游览一首并序》序文中“若不叩寂含章，何以逍遥之趣”，出自陆机《文赋》“叩寂寞而求音”。进入平安朝以后，《文选》和“文选学”的地位更加显盛，后来著名的儒官林春斋（江户前期京都人）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说：“《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仿效《文选》、《白氏》者。”

杜甫以其辉煌的文学成就赢得了“诗圣”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做出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杜诗在日本的传播，更是它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缩影。被称为“五山文学”著称于世的作家群体，对杜诗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岩园月（1300-1375）不仅熟读杜诗而且从杜诗中汲取力量，写下《偶看杜诗有感而作》一诗，抒发了懒惰为耻、发愤自励的心情。中岩的弟子义堂周信（1325-1388）极力推崇杜甫的人格与道义精神，盛赞杜甫“方安史丧乱之际，不失君臣忠义节”，并为弟子们讲解杜诗。义堂的弟子心华之棣继承乃师之志，在讲解的基础上撰成《杜

诗心集臆断》一书，此书深为学界所重。杜诗在日本的流传不仅限于禅林，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同样倾向。当时，杜诗的影响除了表现为一部分诗人对杜诗、杜甫的赞美推崇之外，还表现为对杜诗的讲授与研究，其著作作为《杜律五言赵注句解》、《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杜律七言抄》、《杜律分类》、《杜律抄》、《杜律虞注》、《杜律大全》等数十种相继问世。到了现代，日本的杜诗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铃木虎雄的《杜少陵诗集》、《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目加田诚的《杜甫》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由此可见，杜诗绝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辉。

白居易的《长恨歌》传入日本的时间约在公元9世纪30年代（公元838年）之前。《长恨歌》传入日本后不仅被收载到《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等名籍之中，在日本知识界广为传诵，而且受到日本上自天皇下到平民百姓的普遍欢迎。平安时代的宇多天皇曾命画师将《长恨歌》的人物、故事画在屏风上，又让著名诗人纪贯之和著名女诗人伊势作成和歌来吟诵，《伊势集》中就有以《长恨歌》为题材所作的和歌。伊势根据《长恨歌》的内容，模拟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心境、口吻，作成“皇帝之诗”和“皇后之诗”各5首，以相互唱和的形式，再现了《长恨歌》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大正时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近藤经一的《玄宗与杨贵妃》也是有名的著作，甚至被称日本文坛的“泰斗”的井上靖，也创作了《杨贵妃传》这样的历史小说。可以说，《长恨歌》故事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历久而不衰的创作题材了。

我国历代诗人的无数瑰丽诗篇流传到国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珍贵的遗产。本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文学家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蔚然成风，其中有许多被谱成歌曲和交响音乐，“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首李白的名诗被德国作家贝特该收在名为《中国之笛》的中国古诗集中。1905年这本诗集一出，马上受到了许多作曲家的注意，先后由瑞典作曲家斯约格伦和奥地利作曲家威伯恩谱成歌曲，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和《静夜思》也被许多欧洲作曲家谱成歌曲。外国作曲家的作品中，采用李白的诗谱成的歌曲和声乐套曲的多至不可胜数，德国指挥家和作家冯·弗兰肯施泰因甚至把李白的故事写成了歌剧《皇帝诗人》，王维的《送别》被马勒用作《大地之歌》末乐章的歌词；捷克作家科豪特已在一部声乐中用了王维的《杂诗》、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张籍的《节妇吟》的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打动了法国作曲家罗泰尔的心，他把它谱成了一首出色的歌曲。

中国古代神话和小说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1946年，瑞典学者高本汉写了《古代中国的传说和信仰》一文，高氏认为，古代神话中的主要人物乃是商周时代中国境内各个宗族所记的祖先，是具有某些超人能力、多所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他们的故事具有神圣的意义，其重要情节是不能轻易改动的。日本筑摩书房于1983年出版一套世界神话选，其中第七册《中国的神话：划分天地的巨人》是由曾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调查的君岛久子编著的。该书分列“天地创造神话”、“民族的创世纪”等四栏共收录神话20则；而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口传神话占了17篇。白川静在《中国的神话》（1975年版）里将中国神话同日本神话、西洋神话作了比较。伊藤清司在《系谱型神话的诸相》中，谈到中国神话的特点时指出，中国神话决不是没有体系的，而只是在组织体系上具有自己的、可称为“系谱型”的特点。法国学者雷米·马蒂乌在中国神话研究上做了不少工作，于1978年和1983年先后将《穆天子

传》和《山海经》全部法译详注出版。在《山海经》译本长序的第三节《古代中国神话的来源和其形成》中他就中国神话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1)中外文化交往促进了中国神话的发达，同外来文化接触最多的地区一般也是神话最丰富的地区；(2)战国时期前后中国神话最发达的地区是齐、楚、秦，这表明中国古代神话主要发生在东北方向和西南方向；(3)从神话的主题和类型来看，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神话都同中国的神话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典小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极具特色的部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外学者开始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寻找材料，以深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and 了解，把它们作为了望中国文化的窗口，溶受中国文化的媒介。中国古典小说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在国外的交流与传播，就起到了使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文明的作用。

最早把中国小说介绍到法国的是昂特科尔神父（662 - 1741），他从《今古奇观》中选取了《庄子作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骨肉》和《怀私怨恨仆告主》3个故事，以概述故事情节的形式，编译成法文，发表于杜哈德主编的《中国通志》第3卷（1735年），这也是第一次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法国文豪伏尔泰创作哲理小说《查第格》的时候，就采用了《庄子作鼓盆成大道》的故事作为第二章的依据。伏尔泰对庄子的故事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故事与“庄周鼓盆而歌”比较，除了细节上的不同，如转河、割鼻等等，大致的人物关系是相同的。《查第格》袭用这个文学素材，并非是看重庄周“人心莫测”的遁世哲理，而是运用中国先哲的这一古训影射当时法国社会的人情险恶。抨击时弊、张扬理性。《查第格》从《今古奇观》撷取素材，实际上架起了中法文化在小说交流上的第一座桥梁。它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一起，开启了法国作家从中国古典小说这类通俗文学中溶受中国文化的先例和范例，这一尝试的成功极大地启发、推动更多的作家、汉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小说的介绍和研究上。19世纪法国人对中国小说的介绍表现了较多的自觉性，一些著名的汉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投身这一工作，并把他们的成果带到大学课堂，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形成了一代传一代的研究中国小说的良好风气。这种风气是由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阿贝尔·雷弥萨开创的。他于1826年译完了《玉娇梨》并在巴黎正式出版。他为《玉娇梨》的法译本写了长达数万言的序言，对中国小说作了详细的介绍，是我们见到的有关中国小说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次年，雷弥萨又编纂出版了三卷《中国短篇小说》作为他执教法兰西学院的中文教材。他的弟子——19世纪杰出的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于连安也热心从事这项介绍工作，他译出了《白蛇精记》和《平山冷燕》分别于1834年和1860年在巴黎科塞兰和迪迪埃出版社出版。于连安的两个弟子安托尼·巴赞和埃尔韦·圣·德尼侯爵步老师后尘，前者除大量译介戏剧外，还于1857年发一篇有关中国文学的总论。后者则从《今古奇观》中选了12篇译成法文，分别发表于1885年、1889年和1892年，译文优美，成就大大超过了前人。1851年出版了泰奥多尔·巴维译的《三国志演义》（只译至第三十五回）；1880年出版了泰奥菲尔译的《二度梅》等等。足见19世纪法国研究中国小说，虽以传奇、才子佳人为中心，可也表明进一步的译介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0世纪法国介绍研究中国小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研究者以小说作为观照中国文明、探究中国整体文化不可缺少的方面，表现了更多的自觉性和

活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对此作出有益尝试的是路易·阿苇诺莱法译本《西游记》（1957年门槛出版社出版），而后形成评价中国小说高潮并为这一领域注进新的活力的是70年代法译本《水浒传》等著作的问世。为了使西方全面了解东方文化，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项决议，选译东方国家的文化名著（包括文学名著），编一套“东方知识丛书”，由巴黎最著名的葛利玛出版社出版。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法兰西院士、作家罗歇·卡约和著名比较文学教授、东方学者、作家艾琼伯，他们决定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唐人传奇》、《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列入丛书，约请专家翻译，这是加速介绍中国文化，从而在西方形成一股中国古典文学热的重大举动。在以艾琼伯为首的法国汉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的这些名著先后被译成法文，付梓面世。

从1957年法译《西游记》出版以来，法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就有：吴德明等编译的《聊斋选译》，内选26篇小说（1969年葛利维出版新出版）；雷威安编译《中国白话小说选》、从凌蒙初的初刻、二刻中选择了12篇短篇（1970年葛利玛出版社出版）；张复蕊译《儒林外史》（1976年葛利玛出版社出版）；雅克·勒克吕等译的《卖油郎独占花魁》（1976年巴黎七大东亚出版社出版）；谭霞克的《水浒》（全译书，1978年葛利玛七星文库出版）；雅克·勒克吕等译的《九命奇冤》（1979年巴黎发亚尔出版社出版）；李治华和雅歌的《红楼梦》（全译书，1981年葛利玛七星文库出版）；里科·路易等译《三国志演义》（1963年巴黎弗拉马里用出版社出版）；盛成译《老残游记》（1984年葛利玛出版社出版）；谭霞克的《明代短篇小说选》（1987年葛利玛出版社出版）；以及潘莫诺译的《镜花缘》等等，近20年来，就有这么多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法国乃至欧洲读者见面，成就是惊人的。这些译著的质量也大大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每部译著一般都附有译者本人或专家写的作品、作家介绍，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理解，同时也助于汉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究。

作为一部富有魅力的伟大作品，《三国演义》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早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3百年来，《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美诸国译成多种文字，全译本、节译本、共达60多种。各国学者都把《三国演义》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的明珠，给予高度评价。日本著名作家泷泽马琴的代表作《南总理见八犬传》，汲取了《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朝鲜18世纪“军谈小说”的形式，也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西方不少汉学家选择《三国演义》作为撰写论文的题目，日本人民不只一次地组织《三国演义》之翼访华团，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探讨三国遗址，凭吊三国人物。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传入越南首见于阮莲铎的《三国志演义》，这个译本初版于1907年，地点是西贡。其后，阮安居的译本于1909年在河内出版，继有阮水咏、丁嘉欣、武甲、严春林、贤良、武熙苏、湖海浪人的译本分别在西贡、河内、海妨、巴黎等地出版。

《三国演义》在泰国，同样是泰国文学作品中的名著。1914年泰国前皇家研究院委任一个委员会负责挑选泰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结果选出7部作品，《三国演义》是其中的一部。泰国文坛历来把《三国演义》推崇为泰国散文作品的佳作，翻译作品的典范，被改编成各种形式，广为流传。《三国演义》是由泰国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王（1782-1809）御令当时的诗人、兼财政

大臣昭帕耶帕康（宏）主持和赞助翻译的。120回的《三国演义》被编译成87回的《三国》。约完稿于1806年。1893—1915年的泰国，各种戏剧十分流行，《三国》中的故事情节被改编成歌舞剧广为流传，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如《献帝出游》、《貂蝉诱董卓》、《吕布除董卓》、《周瑜决策取荆州》、《周瑜吐血》等，都是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三国》中的成语、警句如“有眼不识泰山”、“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常被泰国作家和人们用于写作或言谈中。尤其在社交场合，这类语句能使谈话别开生面，妙趣横生。由于《三国》是泰国当时的名作家昭帕耶帕康（宏）执笔、定稿的，所以致使《三国》的部分章节被选作中学语言的范本，《三国》自首次在泰国印刷以来，至1972年，已重版了15次。

《西游记》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早在越南“字喃时期”（大约公元13—14世纪）已有了改写本。而后，1914年就有了陈丰稿的译本。1961年由瑞定翻译的本子，由普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小有删节的全译本，译本中除根据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画册拍照的《西游记》插图外，还附有四篇研究论文。

《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是广泛的。经美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锲而不舍的努力，完整的《西游记》被译成英文，一共分四卷，自1977年以来，陆续问世。1983年2月全部出齐，使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次得以欣赏《西游记》全貌的风采。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赞誉这部《西游记》英文译本以其格外忠实于原著的传神之笔，令人读来不忍释手。早在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年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H·贾尔斯在其所著的英文《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专辟一章，评价了《西游记》及其作者。1912年，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节译了《西游记》全书100回中的约30回，改编并取书名为《猴》，行文流畅生动，很快在西方流行起来。余国藩身兼芝加哥大学东西方文化语言系文学教授和神学院宗教学教授，学贯中西，长期从事国际文学研究，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广博的宗教历史知识和良好的英语文学素养使《西游记》全译本获得成功，使之跻身于当代优秀的译作之林。

《水浒》这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著作，洋洋百万言，塑造的人物在古今小说中，可谓首屈一指。据统计，《三国演义》写了477个人物，《红楼梦》写了448个人物，而《水浒》除丫环、士兵等“龙套”外，有名有姓的就有577个，有姓无名的人物99个，有名无姓的人物9个，无名元姓，但对故事情节发展有一定作用的人物（如鲁智深棒打郑屠中的店小二、戴宗寻找公孙胜在饭店遇到吃面老人及为时迁指路的老和尚等）40个，一共725个。此外，书中提到但未出场的人物还有102人，总共1827人。

《水浒》已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俄、匈牙利、捷克、波兰、朝鲜、越南、日本及拉丁文等1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其中日文译文为最早，有20余种之多，早在1757年，日本人冈岛冠山根据李卓吾批评本《忠义水浒传》译成了《通俗忠义水浒传》，这是第一个日文译文，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对外翻译本，1850年法国汉学家巴赞翻译题为《水浒传摘译》、同年在巴黎《亚洲杂志》第57期上发表。《水浒传》外文译名很多。1883年意大利出版的《佛牙记》节译的是鲁智深的故事，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成德文，改名为《鲁达上山始末记》。德文本中，节译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为《圣洁的奇人》，节译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译名为《卖炊饼

武大郎的不忠实的妇人的故事》。另外还有《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内容都是劫取生辰纲的故事。英译本有写林冲的故事：《一个英雄的故事》。西方最早的七十四回全书译本是德文题名为《强盗与士兵》和法文译本《中国的勇士们》。《水浒》的外译本译得最好的要数 1933 年美国出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译者是 198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布克夫人。她自幼随父来中国，从中国老师读中文经书，精通中国文学，熟悉中国社会，她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赛珍珠。她根据金胜叹七十回本翻译的《水浒》准确、生动、忠于原著，连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都赞誉：“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可见其译本之成功。

《红楼梦》是 18 世纪中叶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它同诗经，楚辞、史记、杜诗、水浒等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形成了绵延不断的现实主义艺术高峰。《红楼梦》书中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等许许多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不仅至今在中国妇孺皆知，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独放异彩。

《红楼梦》最早是在日本流传，1793 年（日本宽政五年），南京王开泰的“寅贰号船”由浙江乍浦驶抵日本长崎港，船上载有图书 67 种，其中第 61 种是《红楼梦》，九部十八套。这个时期，距离程伟之、高鹗第一次木活字刊印一百四十二回《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刚刚两年，而距程、高第二次刊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世称程乙本）则仅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其后，1803 年（日本享和三年），又有“亥七号船”载袖珍本《红楼梦》二部四套来日本，《红楼梦》传入日本后，在当时的日本文人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29 年（日本文政十年），日本一位名叫田能村竹田的文人，在他的《赤屠琐口录》中记述了他借阅《红楼梦》一书的详细情形。在日本外国语言学校里，将《红楼梦》作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从 20 世纪初叶开始《红楼梦》的日文节译本、全译书陆续问世。迄今已有十几种之多，随着《红楼梦》日译本的大量出版，传播面的扩大，日本的《红楼梦》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方面，伊藤濂平先生编著的《红楼梦研究日本文献资料目录》一书作了较为详细的纪录和介绍，迄今为止，日本汉学界研究《红楼梦》的资料书、专著有三四十种，报刊论文多至百余篇。特别有趣的是《红楼梦》在日本翻印流行之后，据说也有人写过续书，内容是贾宝玉曾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巧遇林黛玉，二人由日本天皇赞助，得以在东京举行结婚典礼。婚姻后来还得到了中国皇帝的御准等等。这也足以说明《红楼梦》在日本的影响多么广泛。

19 世纪是中英两国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时期，曹雪芹《红楼梦》流传到了英国。1830 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戴维斯翻译了《红楼梦》第三回片断，发表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第 2 卷上，题为“中国诗歌”，这段《红楼梦》译文不仅原小说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黛玉初见贾宝玉的场面译了出来，而且还介绍和注释了小说中“讥评”贾宝玉的两首《西江月》词。继戴维斯之后，英国人汤姆于 1842 年翻译出版了《红楼梦》，他只选了《红楼梦》中的几段，目的是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之用。1892 年，前英国驻澳门副领事裘里，翻译并发行了《中国小说红楼梦》，这个译本共两册，1892 年在香港出版第 1 册，翌年在澳门出版了第 2 册。1973 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前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大卫·霍克恩翻译的 80 回全译本《红楼梦》。这是 70 年代英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红楼梦》翻译史上新的一章。为了帮助广大英语读者阅读《红楼梦》，堆克恩还在第 1 卷书前加上汉语拼音

说明和长篇评价性的序言，书后附录“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曲”，以及第1卷的人物表，曹雪芹家谱、封底附小说内容简介。第2卷书后附录是关于中国律诗、牌九、若干灯谜等习俗性词语的注释，这些附录无疑是受读者欢迎的。

《红楼梦》在美国的流传，据在美国执教的那宗训教授所撰《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红楼梦善本简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红楼梦善本简记》两文介绍，在程甲本，程乙本之后，“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以及“绣像批点红楼梦”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都有收藏。1929年王际真英译本《红楼梦》在美国问世，它虽然仍是一个仅有原书一半回数的节译书，但直到全译本出现之前，这个节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是颇受推重的。后来译者对译文作了增订再度出版，至今在欧美读者中仍然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因此，“红学”研究者在评价各种文字译本《红楼梦》时，高度评价王际真译本在推动《红楼梦》在西方英语读者中传播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美国作家马克·范·多伦把贾宝玉、林黛玉比作莎士比亚笔下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他这样写道：“《红楼梦》在中国以外的读者中，不会感到生疏和奇特，因为它的人物传达了人类心灵和思想，它的内容真实生动，不会由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其价值。”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颗明珠，它在外国的传播与影响是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各种不同的外文译书有20种左右，至于论述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红楼梦》的外文译本和论著是首屈一指的。

（三）外国名人谈中国古代文学

今天所谓中西文化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共同提高。中国文学的精华，决不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衰退，恰恰相反，它随着研究和发掘工作的深入日益显示其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民族的文明源远流长，在文学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文学艺术意识，这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学出现以后，先民的这种原始文学艺术、历史意识逐渐具有了自觉的形式，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如《尚书》、《诗经》、《四书》、《史记》等，中国文学与史学原始结合的这个特点，不仅中国古代学人有许多论述，而且为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所推重。李约瑟博士在评价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时指出：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的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该承认的。”他们是从世界各民族的比较和“中国人”这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寓言故事、神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一个重要品类，外国学者从文化视角加以审视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作品的发展并不表示民族的幼稚，而是一

个民族深邃的表现。他们认为寓言故事和神怪小说是中国人的心理和梦幻的反映。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存在要想认识它，似乎不应当仅仅知道它的所作所为，还必须探索它所幻想的内容”。从文化心理来看，“中国人是一个对神圣的事物极其敏感的民族”，“在欣赏神怪故事的能力方面，向来被认为如此富有理智，如此质朴、实在和实际的中国，都可以与任何民族的人相媲美”。外国学者对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给予高度评价，称蒲是中国的夏尔·贝洛，《聊斋》是“世界上最美的民间寓言”，其价值在于使人从中了解到“一个令人大为惊叹的民族的深奥的梦幻”，而这种梦幻“也同研究劳动和文化技术、饮食制度、建筑和社会结构一样，都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揭示”。蒲松龄的神怪故事为人类提供了“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是“生活中的不足所作的一种想象性的弥补”，“非但没有把我们带进另一个世界，反而把我们置身于人世间”。

白蛇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作为文学价值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份遗产。法国汉学家雷威安经过研究后说：“白蛇的重要性可与浮士德和唐璜在欧洲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人们不仅在日本可以找到她的“姐妹”，而且在西方也能找到类似的题材。

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外流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法国汉学家阿贝尔·雷弥萨在选译《玉娇梨》后说：中国的古典小说是“真正的风俗小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他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小说可以反映不同民族的风俗，而“真正的风俗小说”具有“真正的价值”。他还说，由于中国的小说所描写的常见主题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弱点、爱好、道德和习俗”，“小说中的人物又具有一切可能的真实性”和“与现实的贴切性”，由于小说家“力图描绘的理想模式和接受它的那个民族精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它能让人们看到中国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了解“难于深入了解的东西”，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是旅行家的游记、传教士的著述无法替代的。他的结论是，如果要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中国小说、特别是描写民风世俗的小说“是必须参阅的最好的回忆录”。法国汉学家于连安也认为，对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来说，“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

中国的白话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白话小说的兴盛主要是适应了17世纪中国长江流域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和都市社会的需要，适应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市民阶层的需要。据此，国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着力描写普通百姓和地方事情，描写他们时代的技术、饮食、服装、制度、习俗和心理等，他们笔下的人物，或是真实的血肉之躯、或是表达人的渴望，而非礼教所要求的圣贤典型。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坦率而亲切的写照，“使人不经过抽象的讨论，便能明了某一时代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观念及成见……他们并指出宗教和道德理想大众化、平淡化后的演

克洛德·罗阿：《卓越的文学家蒲松龄》，见艾莱纳《聊斋选择·序》。

吴德明：《聊斋选择·序》，巴黎葛利玛出版社1996年版。

克洛德·罗阿：《卓越的文学家蒲松龄》，见艾莱纳《聊斋选择·序》。

雷威安：《〈白蛇〉在日本和中国》，载巴黎《中国小说、故事研究》。

斯坦妮斯拉斯·于连安：《年山冷燕·序》，1860年巴黎版。

变，或小说家个人对这些理想的态度，他们也显露社会制度在爱昧难断的种种人类境界中实行时的缺陷。小说因此是连接社会史和人类心灵的交会点”，受到各种不同文化层次读者欢迎，同时受到各种官府的管制利用。

法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据说他在求学时就读过中国《四书》的拉丁文译本，他在1812至1815年，1827至1829年这两个时期曾认真研究过中国。他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中国人举止适度，行事中庸，这方面比欧洲人优越，认为正是中国人在一切方面节制保持才使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1827年1月31日在谈到中国小说时，他说中国小说“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小说所表现的“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谈到“中国传奇”时，他认为“中国传奇”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和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像中国小说“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中国小说这样的“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用起来，很像格言”，“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样，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国外学者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从文化角度进行了评价，他们指出，虽然《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虽然对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封建王朝的揭露，前者较后者，“可能更带悲观色彩，一种与儒家世界观不能分隔的悲观主义”，但这两部小说部“围绕着国家问题展开描写”，“都表现了脱离社会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追求；“梁山好汉”热衷武术，这种狂热与迷恋，建立了他们的价值系统，并显然是他们谈话和活动的內容。而《儒林外史》中文人的兴趣只限于文学道德的价值和活动，这在他们纵酒作乐时没完没了地重复谈论，跟《水浒》不分上下……绿林丛和文人圈，即使不完全相同，也颇相似，它们都显示了合群性，甚至好客性，很显然这首先是中国人的作风。”外国学者指出：他们对朝廷的关系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梁山英雄并非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流寇生活，却效忠宋王朝；《儒林外史》的文人也是这样，面临着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参政入世的矛盾选择。

《红楼梦》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顶峰，所以《红楼梦》在国外的研究与评价是首屈一指的。从文化角度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红楼梦》是人的小说，“它所正视的不是自然和人类的状况，而是人类的自身文化”。小说中所表现的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者之间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文化”相分裂的产物，宝黛之间的心灵默契，是以其文化观的一致为前提的，而他们的文化观又“与周围的环境相对立”。他们“并不拒绝一切文化”，他们阅读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读到的小说和诗歌，从中受到民主、进步的文化滋养。他们之间的爱是建立在反礼教文化基础上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相爱方式和内容连同爱的本身，为时代和社会所不容，而以悲剧为结局。这是十分精到的看法。同时，有些学者还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皮埃乐——艾蒂安·维尔：《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载巴黎《批评》杂志第411412期。

贝纳尔·拉朗德：《关于一部迟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载巴黎《批评》杂志。

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素养的作家，他“虽没有读过陀斯斯也夫斯基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却异常娴熟潜意识和“释梦”之说。他从未发表政治演说，但全书都充满着中国18世纪的思想色彩”。他的书象百科全书那样丰富，象《人间喜剧》那样有趣，是一部宏大丰富的文化画卷，犹如“置身18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可以了解那一时代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与文艺爱好，娱乐活动；信仰、神学与迷信、美食与医药，家庭生产与政治生活；行政与商业；家庭关系与性生活”。

关于鲁迅作品的西方译本，可以说最早出现在法国。早在1926年，侨居法国的“创造社”成员敬隐渔译了《阿Q正传》，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将其推荐给《欧洲》杂志发表，成为西方最早出版的鲁迅作品。在法国，鲁迅作品的大量出版这要归功于被誉为“法国的鲁迅专家”的米歇尔·鲁阿教授以及她的鲁迅小组。米歇尔·鲁阿是德国的一名女汉学家，她于1971年访华回国后，在继续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同时，逐渐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鲁迅作品上。1973年，她与别人合作，出版了法国第一部杂文集《这样的战士》，她本人编译的《匕首和投枪》于1977年问世。据悉，他们将在10年内把《鲁迅全集》全部翻译出版。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界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两位文学家的个人全集相继出版。一位是鲁迅。《鲁迅全集》20卷已由学习研究社出版。另一位是老舍。《老舍小说全集》前10卷，1981年至1983年由学习研究社出版，继这两位作家之后的是郭沫若、茅盾和巴金。郭沫若的《历史小品》、《屈原》和《创造十年》、《创造五年续编》等都由岩波文库出版，茅盾的《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也被岩波文库相继出版或再版。巴金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和《病中集》等由筑摩书房出版。

三、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艺术

(一)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美术

中国美术是世界美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雕塑

197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墓东侧发现了一批秦始皇的殉葬品——兵马俑，是新中国最杰出的考古成果。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考察整个世界的美术发展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发现一开始就震惊了西方，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各大报纸和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都迅速报道了这一考古成果。而后，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来到中国亲赴临潼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壮观场面，众多的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从不同的国家纷至沓来，对兵马俑进行实地考察。这一世界奇迹不仅使他们赞不绝口，而且改变了以往对中国古代雕塑的看法。

以往西方学术界曾认为，中国古代的雕塑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不可能产生杰出的雕塑作品。而且对中国的石窟雕塑评价较低。言及世界上的古代雕塑，必称希腊。乃至形成一种古代雕塑西方优越论的观点。当西方学者看到秦始皇兵马俑时，就纠正了已往的偏见，认为对中国古代雕塑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秦始皇兵马俑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就时间而言，它们与希腊雕塑的产生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其巨大的规模震惊了前来参观的外国学者：500余辆战车，千余匹战马，几千名将士按出兵阵容排开，浩浩荡荡，威武无比。所塑人物、车马严格按真人真车真马比例。有将军、有士兵、有步兵、有骑兵，还有远射程武器。两千多年前的雕塑家运用写实的手法，逼真地再现了当年秦始皇军队气吞六国、统一祖国的气势。将士中有身经百战的老者，也有初出茅庐的少年；有信心百倍者，也有低头沉思者；有的大笑、有的憨笑、有的微笑……不知名的雕塑家们把将士的各种精神状态刻划得淋漓尽致。秦始皇兵马俑在艺术上所显示出的整体气势和写实水平是希腊雕塑无法相比的。就风格而言，希腊雕塑体现的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秦始皇兵马俑体现的则是气魄的博大和运动的力量。

自秦始皇兵马俑出土后，十几年来，已应邀数次去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在美、英、法、日、意等国家受到热烈欢迎并引起强烈轰动。精湛的雕塑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各国艺术界的高度赞赏，许多著名评论家撰文介绍这一世界雕塑史上的杰作。现在，秦始皇兵马俑已被公认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中国画

中国画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支奇葩。与西方的写实绘画不同，中国画特别强调表现作者的主观意兴心绪，强调笔墨的独立性，强调意境与传神。中国画不仅仅在于描绘自然的美，而重要的在于线条、笔墨的韵味，笔墨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的相对独立的美。中国画讲究在画面上题字、作诗、嵌印、诗、书、画、印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创作立意、构图、用线、用色等方面有着一整套规律，与世界各国的绘画相比，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对于中国画这门艺术，世界各国对它的认识在时间上是有先后之别的。大体

说来，东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画是一门很高深的艺术并积极模仿学习。例如早在几百年前，日本的雪舟就飘洋过海来中国学习绘画，回国后成为日本的一代绘画大师。现在的所谓“日本画”实际上是在中国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日本画”的形成，日本著名美术史论家中村不析在其所著《中国绘画史》一书中曾有详细论述。他首先在序文中写到：“中国画乃日本画之父母。”继而指出，中国六朝时盛行佛教画，被日本学去，日本推古天皇时代亦盛行佛像画。中国唐代盛行山水画，日本也派留学生来中国模仿，日本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藤原时代的绘画，即为中国唐代和五代画风之余映。中国宋代以画取士，盛行“院体画”，日本的镰仓时代，足利时代亦从而模仿之。中国明清时代的绘画，日本更加广为学习。中国画家马远、夏圭、米芾、赵孟頫、倪云林、唐寅、董其昌以及清代的四王，都被日本视为已画之画祖而崇拜、研究和模仿。日本著名评论家伊势长一郎亦在其著作中说：“中国画加上地方色，即成日本画。”由此足以看出中国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

西方国家由于诸种原因，对中国画的认识较晚。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产生之前，写实性绘画一直统治着欧洲的画坛，画家们总是力求逼真地客观地描绘自然界的物象。花费很大精力研究透视、解剖。特别是一些学院派的画家，终日做着再现客观现实的梦。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给写实性绘画以猛烈冲击。自印象派画家起，开始醒悟到绘画的终极目的并非是为了准确地再现现实的物象，画家是人而不是照相机，应该强调创作主体的感觉和绘画自身的语言。直到此时，西方画家才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东方绘画艺术上来。谟推尔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法国绘画史》一书中论述了印象派国家受东方绘画艺术影响的过程：其一，1857年，曼彻斯特博览会中，陈列西班牙画家之作品。西班牙与日本相互来往较早，其画家委拉斯开兹和歌德，早受日本画影响，用色明快，构图清新，这是东方艺术最初给西洋画以革命的暗示。其二，1867年，巴黎博览会中，陈列日本版画（即浮世绘）甚多，使法国艺术家大开眼界，竞舍故技，刻意摹仿，此为西方绘画革命之策动。其三，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许多法国艺术家避难于荷兰。荷兰博物馆中藏有大量日本画，避难的艺术家们终日在博物馆里观摩欣赏，悟得其表现技法，遂在油画布上，试作龙蛇飞动之线条，单纯明快之配色，以及清新隽逸之构图，从此产生了印象派。印象派的声势后来逐渐浩大起来，西方现代绘画的纪元开始了。印象派之后，随着中西文化的撞击，部分中国画传到西欧，现代艺术中的野兽派、立体派、抽象主义画家对中国的大写意绘画十分倾倒，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中国画的表现方法。马蒂斯、毕加索对中国画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两人都曾有到中国学习艺术的愿望。毕加索在晚年更加神往中国这片土地，他曾对中国的国画大师张大千说过。他十分希望到中国一睹古代绘画的真迹，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其主观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怕的是看到伟大的艺术心脏承受不起巨大的兴奋。

工艺美术

如果说上面所提及的雕塑和绘画还属于纯艺术的话，对中国雕塑和绘画的欣赏，范围主要还局限在艺术界的圈子之内，那么，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国外的影响则大得多。因为它深得各国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英文中的China一词原指瓷器，后来成了中国国名的代称，由此可见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了。如果说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对于中国的纯艺术，西方

人还很难完全理解和认同，那么，对于集审美与实用于一体的中国工艺美术品，西方人不仅理解和认同，而且把它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西方人认识中国首先是从工艺品开始的。远在汉唐，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就大量出口世界各国了。众所周知的汉代张骞通西域，从此开辟了丝绸之路，使中国的丝绸等工艺品传到西亚和欧洲，后来中国的瓷器又传到世界各国。中国的服饰和家具很早就被外国友人所称道，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中国被世界上公认为“衣冠王国”，具有“衣被天下”的美名。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欢迎，世界各大图书馆纷纷争购，成为世界畅销书。中国的旗袍至今仍是西方妇女所喜爱的服装。中国的明式家具以其造型简洁、结构合理著称于世。在现代家具不断翻新的今天，西方人仍然乐意购买中国的红木家具。中国的刺绣、织绣、剪纸、挑花、泥模玩具、草编、印花布、腊染……都令外国友人爱不释手。一把小小的折扇，因其折合方便、造型优美，同时又是一幅优美的图画，而深得外国友人喜爱。西方人到中国旅游，总是买几把馈赠亲友。中国的风筝也是外国朋友所喜爱的工艺品之一。中国山东潍坊一年一度举办的国际风筝节，吸引着大批的外国游客。每年有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云集风筝城，参观民间艺人的扎、绘、糊、放技艺。当空中飘起各种鸟形、虫形、人物、水族形状的风筝时，总引起外国友人的片片掌声。一百多米长的巨型立体蜈蚣、龙凤呈祥、大狮子、百鸟朝凤、八仙过海等风筝满天飞舞，场面十分壮观，令人目不暇接。在赞叹之余，外国友人体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民族。

建筑艺术

建筑艺术是美术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是颇具特色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近年来不少外国学者进行了专题研究。据来自美国的报道说，宇宙飞船上的宇航员在太空用仪器窥探 50 亿人居住的地球时，据说整个地球上的建筑物只有两处能够清晰地显示出来，一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是埃及的金字塔。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工程。它曲折蜿蜒地爬行在中国的北方。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长城，长城——中国，这是两个融为一体的名词。长城每天接待着众多的外国游人，站在长城上的外国朋友，无不赞叹它的宏伟气势。通观中国建筑，长城仅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其它诸如：（1）宫殿。古代帝王的居处与陵寝及其他佛寺、道观，上有飞檐，下有崇阶，朱门碧瓦，风格富丽堂皇，故宫可为其代表；（2）园林。曲榭回廊、亭台泉石，风格清幽潇洒，苏州园林为其代表；（3）桥。叠石为穹窿式，著名的赵州桥为其代表；（4）塔。立于佛寺，有七级、九级、十三级之分，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可为其代表。遗憾的是，中国许多优秀建筑如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唐代的含光殿都毁于战火。不过现存的宫殿、园林、桥梁、亭塔数量可观，引起了许多外国学者的注意。特别是明清园林，国外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本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建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已呈现出弊端：忽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冷漠，缺乏人情味。为了消除这些弊病，西方的后现代建筑艺术家把目光转移到中国的园林上来，他们发现，中国的园林建筑有许多优点。如它十分注意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它院中有院，园内有园，具有曲径通幽之美，在有限的面积之内，表现出无限的情趣。木质结构给人以温暖亲切之感，建筑与室内陈设风格相统一。特别是建筑的文化内涵鲜明，与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观念极为统一。许多建筑学家特地来中国参观园林，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家的宝贵经验。80 年代，美国还花费巨

资仿照苏州狮园结构在纽约建造了一处园林。随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中国的建筑艺术将会更加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

（二）中国书法在国外

书法艺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东、西方的学者和艺术家，无论懂不懂汉字，无论对中国文化持有什么样的看法，都被书法这种独特的形式所感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而且，许多外国学者克服文字上的种种困难，学习这门古老的艺术。目前，中国的书法艺术已在几十个国家生根开花结果。不同肤色的人都乐意拿起毛笔，体验一下书写的韵味。

与中国相邻的几个东亚国家，如日本、朝鲜、新加坡等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早就开始学习中国的书法艺术。以日本为例，远在公元 57 年，倭奴国王就遣使东汉，接受光武帝所赐“汉倭奴国王印”。之后，日本不断派人来中国学习书法艺术。公元 9 世纪，日本的最澄、空海、橘逸势先后渡海来到中国唐朝的都城长安学习书艺，回国后又大力传播，成为日本书法史上最著名的 3 位书法家。日本平安时代的嵯峨天皇也热心于书法艺术的研习。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日本学习书法的人日益增多。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书家中林梧竹以一介布衣抱着专门学习书法的目的渡海来中国学习魏六朝书法，自此之后，日本的秋山白岩，西川春洞、日下部鸣鹤、宫岛咏士、山本竞山等等，以学习书法为主要目的，相继赴中国留学。特别是中国书法家杨守敬的东渡日本，携带大量六朝碑贴，并传授碑学之技法，日本朝野竞相学习、风靡一时，在日本刮起了“杨守敬旋风”，杨守敬被日本书法界称为“现代书法之父”。近代以来，日本书法发展迅猛，出现诗文派、少字数派、前卫派等众多的流派。当今的日本，已是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而在文化上，对书法艺术的兴趣有增无减。请看一组数字：

日本现有书法团体 580 多个。

在日本全国声誉相当高的书法大家，日本称之为巨匠的共有 225 人，载入书道年鉴的较著名的书家，仅东京就有 1500 人左右，千叶县一个县就有 430 人。

日本著名的书评家，理论家有近 40 人。

日本全国设有高等书法讲座的大学和短期大学共 117 处，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教授和助教讲书法课。

日本的书道组织大多有自己的书道杂志，据统计，日本的书道杂志共计 360 种之多，其中定期出刊的约 200 种。

日本全国主要用于书道展览的场所共 183 个，仅东京就有 59 个。

日本全国各地的书道展览相当频繁。1984 年，1 月份到 3 月份全国举办书道展览共计 580 场次，平均每月举办 193 场次。

日本书法爱好者约占全体国民的十分之一，参加书道组织的约 10 万人。

日本的书法教育一般由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周上课一次，高中到大学阶段，学校设有艺术课包括书法、美术、音乐等可以选修。

无须列举日本学者对中国书法的高度评价了，以上这些数字足以证明日本人热爱书法的程度。经过世世代代的谦虚好学，日本人在书法领域已取得

了杰出的成就。书法已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至首相大臣，下至妇孺百姓，都以能写一手好汉字为荣，汉字书法在日本应用十分广泛，不仅在包装设计，广告宣传方面广泛运用，而且成为室内设置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议会、政府的大厅，还是普通居民的起居室，都配置以装裱精致的书法作品，以求高雅之趣。

与日本人相比，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理解是较为浮浅的，而且接触的时间也较短。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书法是神秘的、抽象的艺术。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中国书法所蕴含的审美趣味，西方人是不会体会到的。尽管如此，他们仍被书法飞动的线条，错落的章法、多变的结体所吸引。如1991年的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当七国政府首脑在协议上签字时，美国总统布什对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用毛笔书写的汉字签名倍加赞赏，认为海部的签名最美观，富有艺术性。西方人开始对书法感兴趣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本世纪初，现代派艺术在西方崛起，一些画家厌倦了传统的写实绘画，开始寻找抽象的绘画语言。这时，他们注意到了中国古老的书法，那特殊的线条组成形式和变幻多端的用笔，那起伏昂扬的节奏给抽象派艺术家以很大的启发。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在创作时曾借鉴书法的构成和用笔的节奏，创造出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作品。

近些年来，西方对中国书法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书法是抽象艺术的大本营。西方的抽象艺术家应该从书法中寻找自己相近的语言。不懂中国书法，就不可能了解东方的文化。目前已有一些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专程来中国学习书画艺术。西方学者已开始了对中国书法的研究。

（三）外国学者论中国戏剧

西方人对中国戏剧接触的时间较短。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别，西方人接受中国戏剧需要一个过程。曾经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德国文豪歌德，虽然一度想介绍中国戏剧，但终因沉悟到东西世界观很难结合而放弃这个计划。最早翻译到西方的中国剧本是《赵氏孤儿》，时间是18世纪30年代，翻译者为波摩神父。进入19世纪，西方学者所注重的只是中国戏剧的伦理主题，对于舞台演出的种种惊人成就，如象征主义、充满想象力的无布景舞台、美术化的动作、艺术化的化妆、音乐等，都未能认识。法国戏剧家伏尔泰曾经把《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并搬上舞台演了16场，但伏尔泰主要是为了好奇，对中国戏剧的艺术性并不很了解。中国剧团第一次到欧美演出是在1860年，先到巴黎，后到旧金山。慰问了在美国受苦的华工。19世纪以后，由于东西方有了贸易往来，到中国来的西方人逐渐多起来，他们在真正到戏园子里看到中国戏的演出之后，却表示无法接受而嘲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0世纪后，西方人逐渐对中国戏剧有了好感。《汉宫秋》、《灰阑记》等戏目受到西方人的欢迎。1930年，梅兰芳到美国各大城市演出，梅兰芳的精确优美的姿势、做功所表达出的动作语言，为美国戏剧舞蹈界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西方人常听说在中国舞台，一个人拿着根马鞭就象征他在骑马，船夫一桨在手，舞台即变成江海，在他们目睹表演之后，无不啧啧称奇。1935年3月至4月，梅兰芳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结识了世界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布莱希特、戈登·克雷，与他们切磋艺术、交流心得，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这些艺术大师们对中国京

剧和梅兰芳的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 1935 年 4 月 14 日的座谈会上，他们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

斯坦尼斯拉夫基认为：中国京剧是伟大的艺术，第一流的戏剧。“梅兰芳博士以他那无比优美的姿态开启一扇看不见的门，或者突然转身面对他那看不见的对手，他这时让我们看到不仅是动作，而且也是行动本身，有目的的行动。我一边观赏这位中国人的表演，一边再次深信凡是对表演艺术真正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此取得一致的观点：不在于动作而在于行动，不在于言词而在于表达。所以，梅兰芳博士，这位动作节奏匀称、姿态精雕细凿的大师，在一次同我的交谈中强调心理上的真实是表演自始至终的要素时，我并不感到惊奇，反而更加坚信艺术的普遍规律。”

梅耶荷德认为：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犹如一颗炸弹，在苏联引起强烈振动。梅兰芳的高超之处，一是手的表情动作优美，二是节奏速度的准确。中国戏剧的动作有现实主义基础。它们都是由民间舞蹈——由一种文化衍生出来的；在这种文化中，舞蹈家和扛着扁担过街的人或者卸车运货进仓库的人都把他或她的动作视作舞蹈动作；并不像固定的芭蕾舞步而像基于一定节奏的步伐。动作里有舞蹈，舞蹈里有节奏。

爱森斯坦认为：中国戏剧“抽象性”的表达方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譬如说，一张桌子可以代表许多不同的事物——餐桌、公堂围栏、祭坛等。再如一种马尾做的尘指，它的功能更加灵活。一方面，它是神、半神半人和其他各种精灵的标志；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被侍女用来表明她在打扫房间。然而，这些范例有趣之处主要并不在于一物可用来标志另一物，更重要之处在于它意义的不固定性或灵活性。这就是说，那个标志依据它周围的其他标志而能代表许多不同的实物和概念。所以中国戏剧运用物体和“道具”具有非常显著的多种意义的解释，这一点对中国的表达方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单词、物体、标志并不像西方式的思维逻辑那样给予单一确切的示意概念。但是，这种标志——由一两个标志组成的象征却给人一种直接的美享受。中国戏剧把我们领回到感性思维阶段，领回到中国象形文字所保存的那种形象、思维和感性相统一的整体。

英国戏剧理论家戈登·克雷认为：观赏梅兰芳的戏剧表演，就如同步入一场我从未相信会变成现实的梦境一般。这是视觉音乐的典范，其中每一细节都服从有机结构的要求。脸谱的神奇魅力从未消失，梅兰芳扮演白娘子时，摒弃一切“摹仿”手法，成为纯正的形态。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指出：中国戏剧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清除错觉的作用。它不要求观念自始至终保持那种把戏当成真事的幻觉，舞台布置方面也表现得简便，但也并非像西方某些实验性舞台上可以见到的那样，以自我标榜的含混方式“清除”一切。在演出过程中，观念席的灯光一直亮着，观众相互之间清晰可见。中国观众没有那种自然主义幻觉，而西方观众却好象对那种幻觉就像对鸦片烟那样上了瘾，尽管他们在马戏场或拳击赛场观看同样场面时，倒颇有排除那种幻觉的心理准备。据报导，梅兰芳博士在访美演出期间不得不解释他虽然在舞台上扮演女性角色，却不是个有异性模仿欲的人。报刊不得不发专栏强调梅兰芳在各方面都很正常，是个有妻子儿女的人，而且还是一位银行家。我们知道，为了避免在某些地方发生事故，有必要对观众说明那个扮演坏蛋的演员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坏蛋。当然，这不仅是由于观众的原始幼稚，在同等程度上也是由于戏剧艺术的原始幼稚。中国

戏剧的观众却从这些强迫的反应中解放出来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方面去。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被迷惑住而忘记这位中国演员是一名男演员，我们便可以无拘无束地观察他怎样把日常语言转变为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看到他一个人在舞台上，实际上等于同时看到不下于三个人物：一个在表现，另两个给表演出来。例如，假定我们看到一个姑娘在按照规定的方式准备茶水，她以精确的礼仪姿态在那样做，那些姿态是完美无缺的。第二方面，这位演员表现这个特定的姑娘心烦意乱，或者心情平静，或者情意绵绵。于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在第三方面又表现一位演员怎样凭借那些精确的姿态来表达心烦、平静或者在闹恋爱。演员在舞台上既观察角色的行动，以观察自己表演的行动。

中国戏剧能教导我们的是以惊讶的眼光观察寻常的情势：不仅观察那些暴露出来的而非隐蔽的戏剧“奥秘”，而且主要观察那些被揭去覆盖着“理所当然”和不可改变的面纱的社会关系。

从以上这些西方戏剧大师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戏剧评价之高。近几十年内，西方的戏剧家们不仅从理论上研究，而且在实践上吸收中国戏剧的长处。美国戏剧学者史考特除整理出一系列有关中国戏剧的论著外，还执导过《四郎探母》、《蝴蝶梦》。尽管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中国味，但史考特要求演员努力学习京剧的舞台动作，包括走路、跑圆场、象征动作、繁复的水袖做工、脸上的表情、头发和胡须的动作，以及舞蹈特技等。演员也积极配合，演出时一次次搏得观众的掌声，使美国人大开眼界。德国的布莱西特则采取有选择地吸收的方法，吸收了一些中国戏剧的技巧，溶入自己的剧场观念，将其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东西。除了技巧表演之外，他同时对剧本也颇下功夫研究，他最早接触到的中国剧本是《灰阑记》。由剧本中，他发现中国剧场是教诲与艺术性兼而有之。这点发现对他日后的“叙述诗剧场”有直接的影响。法国的前卫剧作家纪涅在《阳台》一剧中，舞台设计采取中国的空间运用方式。服装上，鲜艳多彩的颜色都是来自京剧服装的灵感，至于灯光、时间的用法，也模仿了《三叉口》，黑夜都是以演员的表演动作来象征。如剧中二人上场，他们慢慢前进，身子向前趋，或躲在别人之后，或无目的地乱找，他们的动作显示出是在黑夜之中。

（四）外国舞蹈家谈中国舞蹈

中国的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原始岩画中就有许多记录舞蹈动作的符号，甲骨文中，也出现了与舞蹈有关的象形文字。且不说有文字记载的八卦舞、雉舞，单就从一些美术作品中就可以看一系列有关舞蹈的形象。出土于青海省通县丁家寨的彩陶舞蹈纹盆，是原始社会的作品，清晰地描绘了三组原始人跳舞的情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汉代的画像砖石上都刻画了许多舞蹈的动作。特别是在大量的石窟壁画和雕塑中，表现各种舞蹈的画面更是层出不穷。如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伎乐天，曾使许多外国友人惊叹不已。

外国学者和舞蹈家对于中国古代的舞蹈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近几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步增多，到中国考察交流舞蹈的人越来越多，对中国现代舞蹈，外国同行们也十分关注，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

日本著名的舞蹈家花柳千代和芙二三枝子于1986年来中国考察了北京、乌鲁木齐、吐鲁番、兰州、敦煌、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她们访问的

目的是想了解真正的中国舞蹈，在乌鲁木齐，她们发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每个家庭都有一把叫做“都塔”的二弦乐器，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在敦煌，她们得到了最大的收获，欣赏到了从北魏、唐、西夏至元千余年历史的珍贵的莫高窟壁画。惊讶地发现，壁画中的曹议金家族供养人和等身大的唐代美人的发式，竟与现在日本舞蹈者的发式“立兵庫”一样。看到历代壁画中的舞蹈动作，其优美的姿势使她们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她们认为中国的古典舞蹈保存在昆曲和京剧之中，它受武术的影响也很深，是综合性艺术。被称为民间舞蹈与少数民族舞蹈的是以表现各民族的自豪为目的的。对中国民间舞蹈和少数民族舞蹈，应予以重视，从中借鉴。对中国当今的舞蹈界，她们认为是充满生气的，在世界舞台上会闪耀出新鲜的光芒。因为中国的舞蹈演员身体素质好、体态窈窕，而且人才济济。只要立足于学习本民族舞蹈的优秀传统，一定能产生出优秀的舞蹈家。

瑞典舞蹈家别基特·奥克桑在中国观看舞蹈演出后指出：中国的青年舞蹈演员是世界一流的，素质之好，能力之强，一个赛一个，让人禁不住拍手叫绝。中国人口众多，挑选的余地大，瑞典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中国人应该重视自己的舞蹈传统，不应盲目地模仿西方的芭蕾舞。东方人和东方的舞蹈艺术是沿自然规律之道而动，与天地宇宙融为一体，循环往复，构成永恒运动的大自然整体。加之东方舞蹈始终未受到教会的扼杀，这条以自然为本的根一直延续到今天。只有有根的东西才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才能不朽。

1986年，上海舞剧团赴法国演出神话舞剧《凤鸣岐山》，引起轰动。评论家雅克琳·卡蒂埃在《法兰西晚报》撰文说：这是一台使人耳目一新的舞剧，该剧创造了一种纯中国味的现代舞语汇，并从中掺入了古代宫廷舞、少数民族舞和京剧的剑术，以及惊心动魄的武打。演出结束后，全场掀起了旋风般的掌声。人们对中国演员表现出的非凡的勇武赞叹不已。

美国的舞蹈家卡尔兹·法雷尔在评论中国目前的芭蕾舞时称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西方古典芭蕾舞所体现的19世纪浪漫主义风格之圆熟，完全可以和在西方所看到的最好的表演相媲美。演出的中国主题的芭蕾舞剧，如《红楼梦》，手势的丰富，形式的注重、演技的高超是令人满意的。

四、外国人心目中的 中国饮食文化

人类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解决吃、穿、住、用的问题。但人类的生存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主动地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创造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在人类早期相当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的劳动所得勉强维持生存。随着经验的积累、工具的改进，并且经由采集狩猎过渡到种植养殖，生产力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逐步学会了各种饮食加工技术。在各个文明发源地，尽管人们都经历了相同的茹毛饮血的时代，但是，在文明的进步中，却各自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加工方法和饮食习惯，孕育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华民族创造的饮食文化堪称世界一绝，不仅历史悠久、独具风格，而且丰富多彩、魅力无穷。源于原始先民而又不断发展的日常饮食、物质消费习俗，在文明时代形成以菜、酒、茶、点为代表并辅之以陶瓷器、银铜器等精美食品的文化系统，具有很高的营养学和美学价值。

（一）享誉世界的中国菜

中国号称烹调王国，有悠久、独特、深厚的烹调文化传统。大概由于森林自然火灾的恩赐，原始人于偶然中发现熟食的可贵并得到了火种。古人类学家发现，生活于 170 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已经使用火，北京人遗址中积灰厚达 6 米。生活于 8000 年前的磁山人、裴李岗人已选育出谷子，生活于 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已培育出水稻。此后，小米和大米成为中华先民的主食并驯养了各种家禽家畜，逐步采用陶器、石板、竹筒来烙煮食物。由单纯的烧烤发展到烙、煮、涮等加工方法。炒制食品在金属器具出现后成为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商周时期生产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蔬菜、瓜果、畜禽、鱼蟹等食品及青铜、玉器等精美食品，而且食品加工制作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佐料方面已有了酒、酱、醋，使用葱、椒、蒜、桂皮等。在烹调加工上已达到很高水平。如选料、时令、主副食搭配、刀功、调味和火候诸方面已上升到理论上的总结概括（见于《礼记》、《吕氏春秋》等书）。秦汉一统天下，生产的发展、都市的繁荣，饮食资源进一步开发、烹调技术进一步发展。《盐铁论·散不足篇》列举西汉前期食肆中的 20 款时尚之食及民间摆酒例菜七款。魏晋南北朝时成批涌现食品制造、烹调、食疗等方面的著述。隋唐至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城市饮食业空前繁荣，传统烹调技术更趋成熟，并最终形成苏、粤、川、鲁四大菜系，至今享有盛名。鲁菜有“北方代表菜”之称，始于春秋，历经汉唐，元明清时为宫廷御膳支柱，以爆、烧、炒、炸见长，以清、鲜、脆、嫩著称，讲究清汤和奶汤的调剂；川菜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以小煎、小炒、干烧、干煸见长，以其味多、广、厚、麻辣著称；苏菜长于河鲜、味兼南北，趋甜、清爽，擅长炖、焖、蒸、炒，重视调汤、保持原汁；粤菜善烹制鱼虾野味（尤其是蛇），油重味咸。擅长爆、炒，现在也有以苏粤、川、鲁加湖、闽、徽、浙称为八大菜系或加京、沪为十大菜系的。除这些地方菜外还有寺院菜、宫廷菜、官府菜，少数民族菜等。既各有特色，又同为中国菜，有共同风格，讲究色、香、味、型，基本材料大体一致，基本技法大体一致，器具也十分讲究。

1991年7月，“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首届烹饪大赛冠军刘敬贤出席了会议。他说，中国的烹饪和菜肴在世界上堪称一绝，“吃在中国”为世人所公认。所谓“东方的绸子西方的楼，中国的厨师压全球”。中国菜赢得广泛赞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色、香、味、型俱佳，不仅使人大饱口福，而且得到美的享受，其营养、健身价值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最初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华人的迁移，不少炎黄子孙就是靠着这份宝贵遗产在世界各地谋生。目前国外的3000多万华人除东南亚地区外大部分从事中餐馆业。该业迅速发展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仍呈欣欣向荣之势。

在法国巴黎，1960年有中餐馆181家，1977年发展到709家，1983年有2300家，90年代初达到3500家。在巴黎人心目中，“法国大餐是欧洲饮食之冠，而中餐是世界最佳饮食”。在荷兰和英国，几乎90%的华侨经营中餐馆，在美国和加拿大，中餐馆业历久不衰。美加两国的中餐馆和酒店据统计约有2.1万家，仅美国就多达1.6万家。德国、比利时的中餐馆也各有1000多家，意大利有500多家，瑞典有300多家，丹麦、瑞士、西班牙等国也各有中餐馆100多家。亚洲将近40个国家里，约有15亿以上的人口喜欢吃中国菜。据说日本人很喜爱中国的广东菜、京菜、淮扬菜和不辣的川菜。来华的泰国宾客很喜欢中国的“火锅”，无论冬夏。新加坡人特别喜欢广东口味的菜肴以及天津包子、水饺等。在印尼，中国血统的人较多，印尼也是咖喱的故乡，印尼人喜欢吃中国的咖喱牛肉、咖喱鸡、甚至喜爱吃宫保鸡、鸭肝、糖醋桂鱼、干烧明虾、青椒鸡丝外加咖喱粉。朝鲜客人特别喜爱中国菜中的四川菜，喜欢以烤、蒸、煎、炸、炒等方法烹制的菜肴，并习惯使用辣椒、胡椒、大蒜、芝麻等调味品。中国筵席组合隆重、典雅、精美、热烈、华丽、丰盛，是艺术与营养学的智慧结晶，在世界上久负盛名。

谈到中国的饮食文化，不能不提到豆腐，这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发明。在食品科技史中据重要地位并且有十分乐观的开发前景。《本草纲目》谓“豆腐之治，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文献中大量记载豆腐和豆制品，在五代以后。古代豆腐食品十分普遍，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豆腐及有关的豆制品种类繁多，能调制出数百种菜肴。据说有以“豆腐宴”招待外国朋友而倍受赞誉者。

豆腐传入日本，有人认为在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时，也有人说传日的确切年代在元朝至元四年（1338年）。

豆腐西传大致在近代，20年代初，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留法勤工俭学时，自己动手制作豆腐，竟成高手，开店经营时食客如云，令外国人赞赏不已，很出了一番风头。近些年来，中国豆腐风行世界，尤以美、法、日等国为最。美国《经济展望》杂志称：未来10年，中国的豆腐将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食品。

（二）享誉世界的中国酒

造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夏禹时仪狄开始造酒，又说以杜康为

酒的发明人：“古者小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周代已总结出酿酒的6个要领：如“秫稻必齐，”“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等。

罗伯特·坦普尔指出：“早在公元前1500年，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提到用酒祭祀之事。公元前8世纪，中国古代诗人也曾作诗描绘人喝醉酒的情景。”

“至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就发明了发酵酿酒技术，使酿出的酒中酒精浓度比普遍啤酒至少高三倍。而西方在蒸馏酒精的技术出现前，没有任何饮料的酒精浓度超过11%”。中国“用曲来酿酒”，“中国人还发现，要提高酒中的酒精浓度，只要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加进煮熟的并经过浸泡的谷物即可。”“新疆吐鲁番高昌部落从公元520年开始不止一次地把‘冰冻葡萄酒’中提取的酒作为贡品进献给中国皇帝。用冰冻提取酒精的技术后来被作为检验蒸馏酒精的方法之一。叶子奇1378年所著的《草木子》一书告诉我们：‘每岁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中，辨其真伪，真者不冰，倾之则流注；伪者杂水即冰凌而腹坚矣。’这种方法，直到1570年才被介绍到欧洲，并引起欧洲人的轰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烧酒’的制作作了如下记载：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瓮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制造威士忌的描述。”“在中国，最晚于公元前2世纪便有人饮葡萄酒。公元前126年，使者和旅行家张骞从巴克特利亚带回了优良的造酒用的紫色葡萄。不过，在引进这些葡萄之前，《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有了野生葡萄和山葡萄用于造酒的记载。”

中国酒品种之繁多，风格之特异，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诸如白酒、黄酒、果酒、药酒；高度酒、中度酒、低度酒；酱香型、清香型、浓香型、米香型等等。贵州的茅台酒、董酒，山西的汾酒、竹叶青、剑南春，四川的泸州老窖，陕西的西凤酒，湖南的绍兴老酒等均为我国名酒。

茅台酒最初叫“茅台烧”，因产地在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而得名。其酿造方法采用中国传统的独特工艺，即“多次发酵，分次取酒，精心勾兑，长期贮存”，故尔香味独特，口感好，是世界名酒宝库中的珍品，1915、1916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本应夺冠的茅台酒因中国软弱无能而屈居第二。

山东烟台葡萄酒曾在国际上获金奖，久负盛名，近些年来，山东青岛啤酒厂生产的青岛牌啤酒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

（三）享誉世界的中国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饮茶的民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古名荼、茶茶或茗，其用为二，曰蔬食、药疗、汤饮。《诗·七月》有“采荼”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谓“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可知中国人

《说文解字》

《礼记·月令》

“西方首次发现酒精蒸馏法是几世纪的意大利”——罗伯特·坦普尔。

引自《新华文摘》1987年第6期第204页，1988年第5期第182页。

利用茶叶有 4000 以上的历史。早期典籍中“饮茶”之“饮”，泛指饮食，非独谓“饮用”。显然，早期有一个真“吃”茶的时期，以后才形成泡饮的习俗。以种植、加工为基础，以器具、礼仪、冲泡、品饮为主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

学者考证，汉时，不只《尔雅》、《说文解字》，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体小说中，也出现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至此茶叶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从汉代工褒写的《僮约》一文，可知西汉时茶已成为社会上层人物的日常饮料。早期，人们利用的是鲜叶，约在三国时四川有制茶饼碾沫泡饮的方法，唐时已形成茶叶加工程序，形成产销、品饮高潮，时有陆羽《茶经》问世，为茶书之宗。此后，有目录可查的茶书约 100 种左右，留存至今的不过 58 种。诸如《十六汤品》《唐苏廙》、《煎茶水记》（唐张又新）、《采茶录》（唐温庭筠）、《茶录》（宋蔡襄）、《大观茶论》（宋赵佶）、《宣和北苑贡茶录》（宋熊蕃）、《茶谱》（明顾元庆）等。

古人爱茶，“比屋为饮”。谈古论今、吟诗作赋，调养身心，是一种很高的精神享受。所谓：“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白居易）。“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皎然）、“茶果邀真侣，筋酌洽同心”（韦应物）、“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王昌龄）、“昨日冬风送枳花，酒醒春暖一瓯茶”（李郢）。

据现代科学分析，茶叶含有多种营养物质，除一般地具有营养、提神、清胃、止渴功用外，还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功能。据说还具有减轻原子辐射的作用。华佗《食经》云：“苦茶久食，益意思”；《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

中国的茶种类繁多，最主要的是红茶和绿茶，另外还有花茶、乌龙茶、紧压茶、白茶。红茶为经发酵制成的茶，分为工夫红茶、小种红茶、红碎茶。以祁红、滇红、英红声誉最高，其他还有宜红、川红、闽红等。绿茶为不经发酵制成的茶，分炒青、烘青、蒸青，有龙井茶、碧螺春茶、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等 20 多个名贵品种。花茶中以饮茉莉花茶的人最多。乌龙茶中以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广东的“凤凰单丛”为最。紧压茶品种也不少，如普洱茶、康砖等。

千百年来，中国的茶叶、茶文化不断向外传播，流传到亚、欧、北美、非洲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茶国家和地区也已近 50 个。公元 5 世纪，中国茶叶传入阿拉伯，唐时传入朝鲜。505 年，日本高僧将中国茶种带到日本。1610 年，荷兰人把茶叶运到欧洲。1618 年中国茶从西北陆路入俄，1660 年茶叶被带到美国。

茶传入日本后，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技艺——茶道。如果溯其渊源，则是被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禅师，他宋时来华，习佛经之余，潜心于茶的研究，写成《吃茶养生记》。在 15 世纪初，由高僧村田珠光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日本“茶道”的最初形式，又过了约一个世纪，千利休开创了大众化的茶道——和美学，提出“和、敬、清、寂”的宗旨。日本茶道于环境、器具、礼仪、程序、技艺都十分讲究，为日本女子嫁前必习之课目。

中国茶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由来已久。朝鲜正史《三国史记》载：“入

唐·陆羽：《茶经·六之饮》。

以上均引自《全唐诗》

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日本学者熊仓功夫指出：“在早于荣西把宋代的茶法传到日本之时大约半个世纪前，在高丽也有同宋代饮茶法的交流，这在《高丽图经》一书中可以见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谓：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贡以外，商贾谱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熊仓功夫经考证后得出结论说：“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茶的确经历了极为相似的道路。从同一个中国，不论是时代或是方法，都以相同的形式吸收了茶。”

把中国茶介绍到欧洲的早期文字记载，学者考证是在16世纪中叶。1569年，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克鲁兹所著专门论述中国的《广州记述》在欧洲出版，谈到他1556年在广州看到：中国人“彬彬有礼”，当他们“欢迎他们所尊重的宾客时，”总是递给客人“一个干净的盘子，上面端放着一只瓷器杯子……喝着他们称之为一种‘cha’（茶）的热水”，据说这种饮料“颜色微红，颇有医疗价值”。

与克鲁兹同时代的意大利人拉慕什在其《游记丛记》中也提到茶，书中说：“契丹国复有树一种，各地之人皆用其叶。树名契丹茶。克强府（西安）产之，行用很广，全国宝之。土人取叶，或干或鲜，和水煮之。饿腹时饮二杯，可祛热病、头痛、胃痛、腰痛、骨节痛诸病：唯须很热时饮之。”“此叶几可治疗百病。病名一时难记。痛风亦其一也。咽声太多，觉胃不舒畅时，仅热此汁、略饮少许，片刻即愈。”

另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马菲于158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印度史》一书，提到中国茶叶、泡茶方法及价值、功效等。

明万历年间（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谈到中国茶时说：“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饮料。”“也可能同样的植物会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阴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有益健康的。”

在欧洲，法国人称茶为“the”，英国人称茶为“tea”，意大利称茶为“te”。1601年，荷兰商船首次来华，茶叶随着瓷器中的茶具输入欧洲，荷兰人开饮茶之先并使茶叶流入英法，荷兰人因受福建人称茶为“te”的影响称茶为“thee”，英、法、意对茶的称呼由此而来。

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在中国收集农业、农艺学方面的资料，寄往法国，“现大都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各美术馆。其中最好的一套是中国茶叶栽培和加工的图片。这反映了法国人对中国茶叶的浓厚兴趣，这是因为饮茶风气早在1936年就在巴黎普及了。法王路易十五时代（1715-1774）更曾下令将法国所有银器熔化，以充国用，而以瓷器取代，于是举国风从，瓷茶便

朝鲜《三国史记·新罗本记》（第十）兴德王三年十二月。

<日>熊仓工团体：《略论朝鲜的茶》。

<日>熊仓功夫：《略论朝鲜的茶》。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7页。

二位一体，成为一种热饮习俗”。

英国人与茶结缘在 17 世纪初。英早在 1600 年设东印度公司后开始向亚洲扩张，来亚洲的英国人开始学习饮用中国茶叶并带回英国。1615 年 6 月 27 日英经纪人 R·韦克汉姆致澳门同行伊顿的信中写道：“请替我购买一些上等的澳门佳茗，必须各花色品种齐全，……我将不惜重金支付。”英国最早的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在 1657 年创办伦敦最大的卡洛韦茶叶公司。他还出版了《关于茶叶的生育性质，效能的精确说明》的小册子，说“茶是一种很珍贵的饮料，价格高昂，只有王公贵族才把它用作赠给客人的礼品。”1660 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执政，皇后是葡萄牙公主凯塞琳，带好几箱茶叶为嫁妆到英国，于是饮茶成了宫廷生活的一部分。到 18 世纪中叶，饮用中国茶的习惯已普及英国社会各阶层，如恩格斯所说，此时饮用中国茶已变成伦敦街头劳动人民的习惯了。

英国人对茶的喜爱，从他们对茶的称赞可窥一斑。

1699 年，英国作家奥维格顿在一篇小品文里写道：“饮茶有神奇的疗效，欧洲人习惯了饮酒，但这只能损害人的健康；相反，饮茶却能使人头脑清醒，使酒鬼恢复理智。”

昆斯说：“茶终将成为知识分子所永远爱好的饮料。”

英国神学家兼评论家斯密说：“感谢上帝赐我以茶！世界苟无茶则将奈何？将如何存在？”

当今，茶叶仍是英国第一大饮料，消费量占饮料消费总量的 44.5%，80% 的英国人有饮茶习惯，1990 年，英国进口茶叶达 17.7 万吨，除转销外净进口 14.1 万吨。

中华民族创造的饮食文化丰富多采，魅力无穷。以上只是从烹饪、酒、茶等方面介绍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饮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被发扬光大，扬长避短，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在世界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五、外国人谈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不仅是一项颇具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与斗争实践中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项宝贵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殿堂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繁衍生长在华夏大地上几千年的武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容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竞技比赛、娱乐观赏、陶冶性情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体育领域的智慧，闪耀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

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不为国界所阻挡的。它会以自己的特有魅力引起各国人民的喜爱。别文化如此，体育文化也复如此。

中国武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早在 2000 多年前，雏型的武术就已传到东瀛日本。如今日本国的武道，诸如柔道、空手道、合气道等等，其源头概来自中国。200 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就把中国的武术、气功称之为“功夫”介绍到欧洲。清末民初，武术广泛传到东南亚各国，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会至今在南洋仍有深刻影响。1936 年 9 名中国武术家前往柏林，在十一届奥运会上作了精彩的武术表演，令欧洲及世界惊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武术代表团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对扩大武术影响，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六、七十年代，以李小龙为代表的一批“功夫片”冲破国界，打入国际市场，“功夫”一词几乎普及全球，人人皆知。但“功夫”实则就是武术，则知者不多。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武术也更进一步走向世界。渴望了解武术，掌握武术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大批外国朋友来中国考察学习。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来华访问的人中有近三分之一是为武术而来的，可见，中国武术的魅力之大。而要求派专家传授武术的国家则争先恐后。到 1990 年底，由国家体委派出的代表团、队和援外教教练员竟达 2000 多人次，足迹遍及 5 大洲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北京体院近十年就为世界各地培养了近万名武术人才。各国的武术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武术在众多的国家成了一种新型的“时髦”运动，全球性的“武术热”已经形成。在日本，各种武术团体有上千个之多，练习武术的也近百万人。意大利武术团体林立，仅在 DANSITA 创立的武术研究院中学过武术的就有 1.5 万余人。拥有五、六千个武术组织的美国，练习武术的人数高达数百万人。南朝鲜可谓武馆遍地，已有 600 多个，参加武术活动的约有 50 万人。非洲一些国家虽然在武术上起步较晚，但亦不甘落后，习武人数正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武术活动中来，武术的作用和价值已逐渐被世人所认识和重视。

目前，武术已在 5 大洲开展并都有了联合组织，国际武术联合会也已正式成立。从亚运会武术竞赛项目的设立到世界武术锦标赛的举办，标志着武术跨出了国门，成为世界体育比赛项目之一。武术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老年人认为武术能祛病、健身、长寿；青年人则认为武术既是一项很好的竞技项目，又是一种防身自卫术。现在武术在国外不仅习者甚众，且技术水平发展迅速，日趋与我国接近，这从一些国际性的比赛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学习武术而从中想进一步了解东方的文化。武术丰富的文化内涵深深吸引了外国朋友，使他们为之倾倒。这一东方文化的璀璨明珠，包含了东方文明所特有的文化光彩。许许多多的外国习武者说，

他们习练武术既是为了健身、防身，也是为了从中了解和领悟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有的提出通过习武健身懂得“做人的真谛”，“完善人生的价值”，“提高自身的修养”。称中国武术为“净化心灵的源泉”，“内外兼修的艺术”，“高尚的体育文化”，“民族的智慧结晶”。的确，中国武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于民族的总体文化氛围中孕育、生长、发展、衍化。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充满了东方哲理和艺术情趣。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向世界贡献的一个体育项目，已为世人所接受、喜爱。武术多元的功用和丰富的内容形式，必将成为全人类喜闻乐见的健身、养身、娱乐、竞技、防卫、修性之道。

（一）“风采翩翩，老少咸宜” 的套路运动

套路运动是中国武术一项主要运动形式。这也是有别于其他国家技击木的一种独特运动形式。套路运动，是以技击动作为素材，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武术套路不仅有拳术，还有器械和对练，可谓丰富多彩。由于不同的套路有着不同的动作结构、技术特点、运动风格和运动量，因而其适应面相当广泛，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练习。正因为如此，武术在国外深受欢迎，男女老少皆可习练，就其社会、功用而言，一个套路既可健身，又可修性，既可用于防身，又可用于娱乐观赏。所以外国人赞中国武术是集健身性、竞技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最理想的体育运动；说套路运动丰富多样，风采翩翩，老少咸宜，有学之不尽之感。

拳术是套路运动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国地广人众，且地理、环境、民族、风俗等差异甚大，使武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拳种纷坛，流派众多，风格迥异的庞大体系。仅从1986年全国武术挖掘整理统计来看，较有影响的、体系较完整的传统拳种和地方源拳种，达129种之多，还有许多小拳种、类同拳种，体系不完整的套路和功法，不计其数，甚至有些同一拳种，又有几种技术流派。加之各种长短软硬，形状不一的器械套路和多种多样的对练套路。使得武术套路具有多种的目标和多元的功用，在进行国际间的武术文化交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长拳、南拳、太极拳以及刀、枪、剑、棍等套路，由于是世界锦标赛和州际赛中的竞赛项目，近年来在世界各国普及较广，发展较快。从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上可以看出，许多国家的运动员都能较为准确、熟练地掌握比赛项目，一些运动员不仅素质好，动作快，弹跳高，而且，协调性和演练技巧大有提高，不少运动员已经能较地体现出中国武术特有的“精、气、神”，在器械上也表现出了动作规范，方法清晰，身械自如等特点。本次锦标赛的男子枪术、南拳、剑术、太极拳金牌，就分别被菲律宾、香港、日本选手夺得。虽然有几项没有中国运动员参加，但从他们的技术水平上看已与我们日趋接近。

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是世界武术界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有来自5大洲41个国家490余名运动员参加。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武术在世界开展之广。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是一门艺术，它是人的表演，具有活的灵魂和强烈的感染力。竞技武术，已不仅是力量的宣泄和招势的演

示，而且已升华到造型美、体态美、意境美、节奏美、和谐美的艺术境地。比赛中，扎实的功底，纯熟的技术，良好的素质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对武术更深更广的理解，没有心志意向的配合活动，没有身心的全部投入，就会缺乏对武术技术的充分表达和体现，就不会有完美而出色的表现。这些外国人的武术观，正说明了他们对武术认识的升华。曾在亚洲武术锦标赛上摘走枪术银牌，长拳、剑术铜牌的日本姑娘藤井久子，为习练中国武术，年近30仍未嫁人。她颇有感慨地说：“我天性活泼好动，喜爱体育运动，但日本的拳术缺乏艺术性，中国的武术刚柔相济，具有独树一帜的美的魅力。特别是长拳，兼具竞技性与表演性，是健与美的有机结合，因此，它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甘心情愿为之付出劳动，花费心血！”

西方传统的审美倾向之一，是讲求力与美的和谐统一，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绘画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华武术也许正是在力与美的结合上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程度，适应了西方人的审美要求，使他们一接触便“爱不释手”，并能很快地掌握。相当一部分青年放弃多年从事的空手道、跆拳道、合气道、拳击等运动，转而习练武术。他们认为：武术有着这些项目无法与之相比的表现形式，它运动部位全面，锻炼价值甚大，竞技形式多样有趣，更能充分展示一个人的综合运动能力。长拳，动作舒展大方，快速敏捷，窜蹦跳跃，闪展腾挪，起伏转折，对运动员的素质要求较高。练直来可给人一种潇洒勇猛之感。南拳刚劲有力，动作紧削，具有阳刚之美。刀术、棍术则以勇猛快速见长，练起来激烈奔腾，雄健慍悍。剑术、枪术却轻快洒脱，富有韵律，动作流畅，如游龙飞凤一般。不仅习练者自身能够在这种动静相间、刚柔相济、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运动中得到良好的身心锻炼和自我陶冶，观赏者也能从中感受到武术的魅力，得到一种艺术美的享受。况且套路运动还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技击方法，踢、打、摔、拿、击、刺等诸法是组成套路的技术核心，一招一式表现出了攻防技击特性。一些在散手中不宜采用的技术方法，在套路运动中却能得到运用和体现。套路练习还能提高人的攻防技能，掌握丰富多样的技击方法，既有徒手的，也有各种器械的攻防之法。正是基于以上众多的特点，才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青年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

目前世界体坛作为竞技的套路，在内容、拳械浩繁的武术体系中，只占有很少一部分。而相当一部分传统拳械，因流派众多，规格要求不一，尚不易于广泛开展竞赛。但作为国际间的交流和表演亦不可缺少。许多国家的人们对中国传统套路颇为重视，开展甚广。其原因则认为传统套路技法独到，风格别致，特别突出，内涵丰富，更具有中国的传统色彩和民族风格，学练起来趣味盎然，奥妙无穷。不论是八卦、形意、八极、螳螂，还是少林、武当，都有为数不少的习练者、研究者。一些国家甚至建有单一的拳种或门派的武术馆、院、社、校等。所以我国在推广竞技套路的同时，对传统拳械套路亦积极开展。先后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国际武术节，表演赛、邀请赛以及传统武术演武大会。受到了各国武林人士的大力欢迎。使异彩纷呈的拳械套路在世界各地得以发扬光大，同时也让世界人们更为广泛地认识洋洋大观的中华武术。

太极拳是武术的一大拳种。目前在世界上流行最广、影响最大、习者最多。由于该拳种不仅动作柔和缓慢，处处带有弧形，运动绵绵不断，势势相连，如行云流水一般，非常潇洒优美，而且太极拳具有良好的医疗保健作用，

尤其对人体的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有着良好的影响。加之内含丰富的中国古代哲理，因此，倍受各国人们的喜爱。

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等地的人们在看了中国太极拳后无不称赞其动作优美、潇洒，可谓世界上高超绝妙的舞蹈，一旦他们从事练习后，又被太极拳的健身效果、调节功能以及特有的哲理性所吸引。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中，紧张的工作，激烈的竞争，造成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上负担太重，他们渴望恬静、松弛，希冀健美长寿。而太极拳的练习使他们愈来愈发现能达到此目的。一位澳大利亚的医生说：“我行医多年，感到太极拳比世界上各种运动都优越，因为剧烈的运动时常会伤害身体。人们的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太极拳可以有效地消除这种疲劳和精神压力。”澳大利亚武术太极学院拥有3百多名教练，已有10余万人在学院学过太极拳。不少人打太极拳时“感到是一种最美好的艺术享受。”德国《鲁尔消息》报说：“太极拳将身体放松到流水一样的运动中。”克劳斯·莱森则评价太极拳是一项富有哲理的运动，对健康极为有益。美国的一些思想家认为美国人生活节奏快，又终日 and 机器打交道，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有一种压抑感。要达到平衡，必须寻求一种调节身心的活动，中国的太极拳正是一种理想的运动。许多美国人认为，练中国太极拳可进可退，进可提高技击水平，退可修身养性。太极拳的健身、调节作用已为美国人深信不疑。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计划派人去太空教练太极拳。太极拳在欧美等地大受欢迎，一些公园里随处可见打太极拳的身影，习者遍及各个层次。他们都从这一运动中感受到健身、防身、治病养生的好处。

在新加坡，太极拳运动已成为最热门的体育运动，经常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练习，广泛程度居各类体育运动之冠。他们讲：“太极拳是一项有益于身心的运动，它既经济，又不需很大运动量，老少咸宜，值得在我国推广。”泰国开展武术活动已有40年的历史，约有20万人学打太极拳。该国太极拳健身总会创始人初得威集·哇拉逸说：“综合比较各类拳术，我深切体验到中国武术特别是太极拳，在健身防病上确具有独到而奇妙的功效。”他们总会的宗旨就是把太极拳作为行善的一种方式，即把太极拳介绍给广大泰国人民，使他们通过锻炼、健身、防病、益寿、延年，进而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

日本是习练太极拳较早，习练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1968年日本成立了太极拳协会，遂后日本各市的太极拳组织应运而生，练习太极拳的人数逐年增加，现有60多万太极拳爱好者，全国拥有5000个太极拳训练班，许多大企业和社会团体都开设太极拳。现在日本每年到中国学习太极拳的就有二、三千人，每年还邀请30多位中国教练到该国传授太极拳。日本国民上下对“中国太极拳达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习练太极拳成了日本“时髦”的体育活动，他们将太极拳视为修练身心的重要手段。全日本太极拳协会的宗旨就是：“崇尚武德，提倡忍耐、努力，修炼战无不胜的精神境界。”日本女子太极拳俱乐部的宗旨则为：“修练身心，达到健康身体，培养真正品格和温文尔雅的修养。”北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日本派出750人的太极拳表演队伍，其国人对太极拳喜爱可见一斑，并可见武术在日本的普及面之广和程度之深。不少爱好者认为“太极拳不但能增进健康，而且能了解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精神享受”。日本的太极拳不仅普及广，其技艺水平也居世界前列，仅次于发源地的中国。他们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太极拳选手，如两夺亚洲武术锦标赛女子太极拳金牌的森田久子；十一届亚运会男子太极拳铜牌得主荒井伸

次；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男子太极拳获得者伊藤亮二等。日本政府希望经过不断努力后，把武术太极拳作为日本民国体育中的一个固定项目，并争取在5年后超过中国。

一位利比亚的留学生默德说：“中国武术有着其它任何体育项目所无法比拟之处，它兼能健身、防身、娱乐。譬如，我们已经认识到，太极拳就具有很强的健身作用，尤其对老人和病患者，更是非常理想的强身医疗活动。”在国外，太极拳还被用于医疗康复中。欧洲最大的专治各类疼痛的医院——物浦瓦日顿医院，在英国武术研究院的倡导下，率先将太极拳纳入治疗手段。该院克利斯·威尔士医师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病人在接受太极拳训练以后，病情得到好转。甚至受轮椅束缚的残疾人也能从中受益。”另一名医师罗耶尔也表示，病人们学练了太极拳，身体状况出乎意料地得到改善。太极拳的医疗健身价值正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瑞典太极拳的重要传播者赫曼讲：“练太极拳能松弛身心，你在从事这种运动时，心中就是存在松弛的意念。”维也纳大学的一位老师在学会了打太极拳后说：“我只要一打太极拳，就肯定不会失眠，中国人真聪明……”

国外练习太极拳已不仅仅局限在中老年人身上，一些青年人也是“爱不释手”，不少国家还把太极拳开展到大学、甚至中小学当中去。一位英国体育教师朱查尔·布莱特说：“太极拳能使孩子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恢复平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女教师古佑玛认为：“这项练习使我的学生身体比以前放松了，从而能更好地加强身体锻炼。”澳大利亚的一位精神病专家台维在谈到太极拳的作用时深有感触地说：“还是在大学读书时，太极拳就对我繁忙的功课起了调节作用，使我精力充沛地修完大学课程，现在我又把太极拳教给了学生，并研究从精神上如何达到平衡和放松。”澳大利亚武术太极拳学院是澳最大的武术学术团体之一。这个学说的创办人许荣安介绍说：“在澳大利亚我们已经是一所全国6个省都有分部，拥有5000多在校学生的新式武术学院了。下一步，我们准备向中、小学校发展，按照国际武术组织的规章，拓宽教育内容，巩固普及成果，加强工作，提高质量。”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太极拳将会作为一种教育的手段在各国学校中开展起来。

（二）“摒弃了野蛮”的搏斗运动

搏斗运动是中国武术的又一大运动形式。它是指两人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斗智较力的对抗练习形式。其内容包括徒搏（散打、推手）、短兵、长兵三项。目前在国际武术竞赛中开展的只有散手一项。

散手，俗称散打，是中国武术的一种传统徒手相搏相角的较技形式。古称相搏、卞、弁、白打、拍张、手战、相散手等。由于它往往在台上进行，又称为“打擂台”。自1988年10日深圳举行的国际武术节散手擂台邀请赛起，中国武术的这一运动形式便很快在世界各国开展起来。随之国际和洲际间的各种散手邀请赛、锦标赛、表演赛不断进行，发展迅速。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期间，散手被列为了表演赛，有来自25个国家的近百名武坛斗士，参加了8个级别的激烈拼搏，前苏联、西班牙、巴西分获了75公斤级、80公斤级和85公斤级金牌，可见外国人对中国散手的开展和掌握是相当快的。

我们知道，很多国家都有着自己传统的技击术，有些已经在世界推广，被列为国际竞赛项目。中国散手之所以能被外国人所喜爱和掌握，这说明中

国散手具有自己的运动特色和可行的竞赛方法。日本教练杨进认为：散手与其他徒手搏击相比，完全是一种新的技术表现形式。其队员冈部知刚以多次参加各种类型的徒手搏击比赛的体会说：“中国散手强调了技术，摈弃了野蛮。”罗马尼亚教练说：“在罗马尼亚有跆拳道、空手道、自由搏击等运动，但他们喜爱中国散手，散手的技术丰富，又便于开展。”巴西教练认为：“空手道点到为止，跆拳道腿势轻，还是散手易于接受。”不少运动员认为“现行的散手竞赛重技术，重得分，既安全又激烈”。

中国散手可以用任何武术流派的技术动作进攻对方，这充分体现了散手技术的丰富多样化，“远踢、近打、贴身快摔”的运动既显示了武术的特色，也使比赛更为紧张、激烈、有趣、配以合理的护具及规则又保证了竞技的安全可靠。故尔散手运动颇受外国人的青睐。欧洲一些国家认为他们的身体条件好，具有身材高大，本质强壮，反应敏捷等长处，加之以往长期从事的搏斗经验，在散手对抗中，尤其是70公斤以上级竞争上占有优势。据报道欧洲参加武术活动的人士中有70%以上的人是专门从事散手训练的，其中有不少是过去练过其他搏击术而转改散手的。欧洲散手比赛亦十分活跃，现已举办了四届欧洲散手锦标赛，竞赛规模逐届扩大。法国每年都举行散手比赛，该国青年人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瑞典现有7000人参加散手运动，他们每季度都举行比赛，吸引了大批青年爱好者。罗马尼亚在散手水平上发展较快，该国队员马尔塞尔曾在1991年北京国际散手擂台邀请赛中获85公斤级冠军，影响很大。散手在非洲各国虽不算太普及，但也有不少国家开展了这一活动，并派队参加国际散手比赛，成绩不断上升，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亚洲散手运动开展得相当活跃，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十分普及，很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散手训练组织。新加坡是亚洲武坛的一支劲旅，散手水平也较高，曾先后举办过3次东南亚武术散手擂台赛，6届全国散手擂台赛。南朝鲜武术活动几乎遍及城乡，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散手，近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蒙古、越南、泰国、菲律宾、伊朗等国也都不甘落后，纷纷建立散手组织，邀请中国教练前往执教。原任尼泊尔国家跆拳道教练的西德格，后毅然改弦易辙练起了中国武术，他说：“空手道、跆拳道动作比较简单，招数也嫌单调，而中国武术内容丰富，方法多种多样，其对抗程度和实用价值均不亚世界上任何一种技击术。而且，我们尼泊尔人身材瘦小，敏捷灵活，更适于练中国武术。”

许多外国人认为“散手比赛较力、较技、斗智、斗勇、对抗性强，不仅要求运动员要具备良好的速度、力量、灵巧、耐力等身体素质，熟练地掌握散手的各种技术，还要有敏捷的应变能力和顽强、果断、坚毅的精神以及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品质。散手技法全面，包括了各种流派的技术动作和方法，踢、打、摔相互使用，尤为丰富。但它又不同于蛮打、硬拼的技击术。在规则中严格规定了一些人体薄弱部位为禁击处，并限制了易致伤致残方法的运用，使得散手以增强体质，交流技艺，提高技术水平为出发点取舍动作、使用方法、安全性强，技巧性高。中国散手也有别于世界各国流行的技击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同于拳击，也不同于跆拳道，更不同于头顶、肘撞、膝击的泰拳和不能用脚，只能摔、搓、擒方法的柔道等对抗项目。日本空手道能手脚并用，但没有武术散手的快摔技术，法国的踢脚术也只是以脚为主，配合拳法。此外，诸如印度尼西亚的本扎，日本的相扑，踢拳道、体道、格斗术，以及法国的忍拳等都与武术散手的“远踢、近打、贴身摔”的

技法不同，比赛形式和方法也不同。还认为：中国散手的战术中，如“暗渡陈仓”、“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等还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兵家权谋思想。所以，国外一些散手爱好者在钻研散手技术的同时，对中国古代的兵家思想颇感兴趣。

中国“功夫”很早以前就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无论是在反对外来侵略，还是维护民族尊严中，中国“功夫”都令世人为之赞叹。先是以李小龙为首的一批“功夫片”在世界产生了轰动，使更多的外国人得知东方流传着一种神秘而威力无比的拳术。后是电影《少林寺》的播放，更使他们大开眼界，进一步看到了中国武术更为广阔的内容和技法。继而各种国际间的武术活动，让他们接触到了实实在在丰富多彩的武术运动，同时也真正体验了武术健身、防身、修身之功效。

尽管武术散手与世界各国技击术在技法上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却有着各自的发展模式。中国武术散手是在继承武术传统技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体育竞赛项目。它由于受护具、安全、竞赛等所限，在散手比赛中只能采用部分武术技法，还有相当一部分克敌制胜、巧妙多变的方法，被作为防身自卫的实用技法而存在。这些技法亦为外国人所着迷，如点穴击要，擒拿锁闭，肘膝头击及一些在特定环境、状态下的御敌之法等，实用性强，变化多端，不失为防身自卫的法宝。一些外国姑娘对此深感兴趣，酷爱习练，把会中国武术引以自豪。不少国家已将中国武术作为部队、警察等训练格斗的一种手段。

（三）“独树一帜”的东方文化艺术

几千年来，中国武术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深受民族文化精神的滋润和哺育。它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中医、民俗、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军事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正是这种交融和互鉴，使得武术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正是其他现在体育项目所望尘莫及的。同时这也是外国人为之崇拜和研习的一个重要因素。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不仅视武术为健身强体，娱乐竞技的体育项目，更把他看作东方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东邻日本近年来对亚洲及国际武术运动的发展建树颇多，练武术的人数若按人口比例不会比中国少。其中不少人是把武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日本 KOBE 太极拳俱乐部就视太极拳为“体育文化”。少时练过剑道、空手道、合气道，并获得“黑带”段位，后又改习武术的千叶明认为：武术是中国一种很高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性、艺术性和竞技性，更为重要的它还具有深奥的哲理，充满了东方哲学思想的内涵。这一点，是世界上众多的“功夫”难以企及的，因此也就成了中国武术格外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他本人则更醉心于对中国武术“气”这个概念的研究。在日本研究武术内涵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哲学、宗教、中医到文学艺术、道德伦理、军事等无不涉及。这也许与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多的缘故有关。

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越来越重视，不断有新的认识。他们开始认真学习汉语，学习武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并试图进一步在武术中寻求未知的感受，热情之高前所未有的。一位习练太极拳近 20 年的美国人 Howard. Dewar，他在习拳过程中，由初时的好奇，开始探索其美感奥秘之所在，进而

置身于老庄及其他道家学说之中，深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最后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太极理论与佛教的禅宗思想的密切联系。他说自己研习太极拳不为表演，更非试武，而是追求其“修行”的作用。在学习中，他感到东方哲学思想有其妙不可言的独到之处，他要通过太极拳原理来洞悉东方文化的玄妙微机，补足西方文化思想欠缺部分。美国纽约现代武士学校的校长及创始人费尔·麦西纳则说：“我们非常赞赏中国武术的武德。求生存不是武术的精神，武术的价值比求生存重要得多。”他为了改变有些学生练武仅仅是想掌握格斗技术，而对真正的武术精神迷茫，于是，他“下决心带一部分学生来中国，以便帮助他们寻找真正的武术传统、文化、哲学和精神，进行武术寻根”。他自豪地说：“这次旅行赋予了我更多的智慧，完善了我的人生。”可喜的是，美国一些家长让宝贝儿们学习中国武术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强身健体，同时也希望他们接受武术中“尊师重德”等优良传统，成为有礼貌、讲道德、守纪律的人。不少习练武术的外国人，都感到从习练中国武术中学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确，武术教育历来重视武德，以“尚武崇德”作为武术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培育习练者养成尚武崇德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传统的中华精神在武坛的缩影。加拿大留学生佛兰斯说：“武术有数千年的历史，包含着深奥、十分完整的哲理，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武术的哲理是非常平和、宽容和利它主义。从事武术的人要学会怎样格斗，甚至要掌握置人于死地的本领，或对别人施加暴力。事实上，武术家们使用暴力比普通人更少，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积怨需要发泄出来。他们懂得怎样发功医治自己和他人，怎样进行自我控制和掌握自己。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有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达到。”

一位神父颇有感触地说：“武术源于中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净化的源泉。它将人们引进一种创造的过程中。它使人和自然界结为一体。它还是一种心理的训练，使人们在训练中得到自信，学会真与善构成的世界中和谐地生存，并用快乐支配属于我自己的身体、知觉和灵魂，使我能感受到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正是武术带给我的收获。”墨西哥的武校教练安东尼奥·弗洛雷斯说：“学习武术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以及高度的文明，尤其是对于强身健体、修心养性所达到的惊人作用。”马来西亚武术代表团联络主任，龙狮团团团长周兴顺讲：“中国是武术的故乡。武术的外延和内涵都是丰富的。”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汉利斯在看过中国武术队的表演后讲到：“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武术，它不仅是一项健身、娱乐的活动，也可作为教育的一个内容。”

武术的博大精深令外国人为之倾倒，很多外国人士已不满足于掌握武术技艺，领略武术风采，而把思想触角伸向武术的深层，从理论高度上探讨武术技术，研究武术的哲理和文化。在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论文报告会中，就有 10 多位外国代表分别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伦理、技击、养生等方面对武术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多功能价值观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研究。

武术理论研究的热潮日益在全球形成。各种武术刊物也在异国他乡纷纷出版，并深受喜爱。美国、日本、法国相继出版的《中国武术》杂志，就是介绍研究武术技术理论的专门刊物。前联邦德国把太极拳视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形体表现，他们出版的武术杂志则取名为《中国哲学与太极拳》。华盛顿一位研究东方历史的学者罗伯特·史密斯先生，不仅娴熟中国武术、功夫甚深，且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拳术》、《少林拳》、《心

意拳》、《八卦拳》等探讨介绍中国武术的著作，影响很大。

武术，无疑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精华部分。中国武术，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前苏联一个搞地质的女工程师在受到中国教练的传授后激动地说：“你们是最伟大的人，因为你们不仅教给我们武术，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最崇高美丽的艺术。”南斯拉夫人看过中国武术团的表演后评论：“中国的武术历史悠久，使演出达到了高潮。技艺高超的武术，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在土耳其国际儿童艺术节上，中国少儿艺术团的精彩表演令那里的人们激动不已，一位老校长在告别会上含着泪说：“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感谢天真可爱的小天使，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带来了珍贵的艺术，特别是武术，使我们大开眼界，从孩子们的身上我们感到了武术精神，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约旦大使曾对中国武术负责人提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人民，你们应当到约旦去，把武术教给那里的每一个人。”新加坡记者评论说：“中华武术是一种增强体质的体育运动，又是反映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优美艺术，而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中国武术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不仅大大提高了华桥在国外的地位，同时也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更加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加了解中华民族。

一位外国留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外国人的武术价值观的调查报告，他通过对16个国家110名18岁至70岁习武者的调查，在武术12种价值因素中，侧重武术的教育和文化价值的人数占87%，人数最多。他在结论中说：“武术是通过运用古朴的哲学思想、指导练习者在身心两方面进行自我修养，提高认识世界的水平和自我控制能力。”他呼吁“在武术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既要努力跻身奥林匹克，又不可忽视武术的文化属性。……使武术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合理的，适合国际现代社会发展的教育手段”。

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武术已经扣开了世界之门，正稳步地向世界发展。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奉献。武术的独到健身方法，将打开人们强身健体的新途径；武术的修心养性方法，将启发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入世之学。武术的竞技，将为国际体坛添彩增辉。愿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分享中国武术的功用。

六、令外国人瞩目的中国经络学说和气功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指出：“今天我们所不懂的东西，比懂得的东西要多得多；在人类社会，未知世界远远地超出已知世界。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等，都还有许多未被人们认识的东西。”

中医经络学说、气功，可称得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的考验之后，她得以在高科技的20世纪立足，说明她是有顽强生命力的，是经得起并且需要科学的验证的。她已经被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了解、认识并赢得广泛赞誉。在今后，她将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赏识。当人们用高科技的目光审视这一神奇的领域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感到某种困惑，而这困惑，也正唤起了人们进一步探究的好奇心，也许，一个医学和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正在这种好奇和探究中酝酿着……

（一）源远流长、方兴未艾

通观古今中西的人体保健之术，可知有两个不同视角，两种不同途径，一日养生、防病；二日治病；就治病而言，又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尽管中医不是像西医那样建立在精密的科学实验、分析的基础上，但中医绝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她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长期经验的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整体思维特征，重养重防，以常有奇术奇效而著称。而“气功”则可谓奇中之奇。

气功离不开古老的经络学说，二者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密切联系，可以说，古代哲学是气功的灵魂。

与气功密切联系的中国哲学思想是具有典型的整体思维特征的天人关系理论；阴阳五行说；精、气、神，形神关系理论等，保存在《尚书》、《易》、《老子》、《庄子》、《管子》等重要典籍之中。

《庄子》不仅仅是气功的理论前提，而且已经包含了显在的气功理论，如“心斋”、“坐忘”等。所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随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道，此谓坐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以静以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另外，还有《养生主》、《知北游》中的一些论述，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气功思想，而且已经包含着做气功的方法，步骤。先秦时期的气功专著，《汉书·艺文志》载有《伏羲杂子导引》、《黄帝歧伯按摩》、《神农杂子导引》等8种共152卷。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行气玉佩铭》虽仅几十字，但却是重要的气功文献。70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帛画《导引图》是我国古代导引术的一个缩影。图前端有《却谷食气篇》26行。《山海经》甚至谈到列姑射山上有神人“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

转引自《气功365台历》，黄山书社1989年版。

《庄子·养生主》、《庄子·大宗师》、《庄子·在宥》。

铭文：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空，空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春在上，地几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泉，形如处女。”《列女传》说彭祖擅导引行气，从夏至殷商共末年共活了 800 多岁。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了《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两部重要的古医学帛书。成书于先秦，为现存已知最早的记载人体经脉学说的文献和灸疗学专著，描述了人体诸经脉的循行路线及相应的病症与疗法，开中医经络学说之先河。

经络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联系全身、运行气血的通路，包括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经脉、孙络、十二经筋及十二皮部等。成书于汉，集周秦至西汉医学之大成的《黄帝内经》是研究经络学说的必读之书。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经络联系起来的统一整体；认为人的面、目、耳等与人体诸器官、肢体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故有耳针、手针、足针等疗法》；认为人的生命过程、生命活动与天地万物生化流行密切联系；认为人的生命是形、神、气三者的统一。

气功的要义不在于“外练筋、皮、骨”，而在于“内练精、气、神”。通过练气功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扶正祛邪，达到防病治病、健康长寿的目的，有些气功师发放“外气”给人治病，进行气功麻醉用于外科手术，诱发特异功能，而许多气功表演本身就带有神奇的特异功能色彩。

50 年代以来，气功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气功研究组织、学校、医院、疗养院等。出版有许多专业书刊。

1981 年 9 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1986 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1987 年，中国气功功法委员会成立；同年 8 月，我国第一个青少年气功科学研究会在银川成立；1988 年 8 月，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文献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全国性气功研究机构的建立，说明我国气功已经进入有组织地研究和利用的新时期。

气功作为养生健体、防病治病的独特手段不仅在国内受到重视，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在国外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加以研究和利用。

（二）中国气功在国外的传播、应用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以数千万计的气功爱好者，人们对中国气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外国考察团、参观团及个人频繁来中国进行参观、考察并邀请中国气功专业人员出国讲学，举办训练班，教外国人气功。

我国气功专家，国际气功信息研究所所长林厚省教授的名字为新加坡人熟知。林厚省在香港教授太极气功十八式，使许多患慢性疾病的人得以康复。消息传至新加坡，新加坡一些患有疾病的人向印尼华侨学做此功，绝大部分人病情消失或好转。于是，太极气功十八式在新加坡便扎下了根。当地报载，练此功法者有 10 万人之多，除新加坡外，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等国也形成太极气功十八式热，参加锻炼的人数已超过 100 万，并向美洲和西欧国家发展。

据林厚省教授介绍：在欧洲，波兰和前捷克把气功作为训练运动员的项目之一，并在 1964 年奥运会比赛中获得良好成绩。此后许多国家对此都重视起来。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会长鲁克斯悉心于通过科学方法来研究气功的作用。他经长期观察后，宣布“心灵能”确实存在，并说气功并非不可思议，而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中国的按摩术在唐代已传入法国。20 世纪 30

年代，汉学家马伯乐曾在《亚洲杂志》上介绍过中国气功的《胎息法》、《闭气法》等。在前四德流行“呼吸自我训练法”。有的中小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利用气功作为恢复疲劳的有效手段。1974年5月，瑞士玛赫瑞希研究大学曾做过一个有意义的实验：对气功师脑电波的变化进行测试，发现气功可使脑电波频率减小，而波幅则增加3倍以上。1975年，玛赫瑞希研究大学又从生理学、生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气功进行了综合研究，并根据其“综合性研究计划”，邀请世界上的一些科学家参加此项研究，出版了《超觉入静与飞行法》文集。在奥地利，医学教授舒利茨于1958年发表文章，谈在体育运动中采用气功的重要性及具体方法。他把这种训练方法叫做“奥陶根训练法”，以后很多国家都把它译成“放松训练法”。国外自60年代以来把气功应用于体育训练，1964年东京奥运会及一些重大国际比赛中，前苏联、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运用气功方法于训练中，取得了好成绩。

美国约有十几种传授气功的训练班，如“超觉静坐训练班”、“欧赫训练班”、“生理回馈训练班”、“行为矫正训练班”等。美国把气功作为宇航员的必修课程之一。

在加拿大，气功疗法颇受欢迎，仅安大略医学协会，就有300多名医学博士倡导气功疗法，临床研究上也相当活跃。参加气功临床实践的有近4000人。他们不仅治愈了一些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功能性疾病，而且还治愈了一些器质性疾病。

前联邦德国波恩大学教师基塞娜·西登布兰德曾运用西医学理论研究睾丸癌检测方法，取得了重要成果，本应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可她在研究中途接触到了中国的老子、庄子、中医、气功，并很快被中医的整体观所征服，甚至产生奇妙的幻想：用这种观点帮助人回归大自然，战胜一切疾病的侵害。她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于1986年夏天入北京国际气功培训班学中国气功。她学得非常认真，可练功时又茫然不知所措。一个“丹田”，就让她好找。她查遍记忆里的整个人体解剖结构，也找不到“丹田”的确切位置，更谈不上在练功时“守”住它。培训班指导教师及时发现她的为难之处，单独为她讲解，反复示范。气功培训班结业之前，基塞娜终于叩开了中国气功殿堂的大门。

美国哈佛大学80年代进行气功对高血压病疗效的观察。据称36例高血压患者治疗前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为146/94.6毫米汞柱，采用气功治疗与不采用气功治疗的对比试验表明，前者使病人经过一个疗程后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20.4和14.2毫米汞柱。后者只是模仿气功训练的样子在睡椅上静坐，其收缩压和舒张压仅下降了0.5和2.1毫米汞柱。

据美籍教授牛满江介绍，纽约洛克菲洛基金大学用气功治疗高血压，参加实验的有500人，半年后，75%以上的人都有显著疗效。有关卫生组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气功对缺血性心脏病的室性早搏有效。他们通过一种遥控监护装置，对患者进行昼夜观察，发现11例病人中有8例病情减轻，早搏次数由治疗前的每小时151.5次下降到131次。圣地亚哥海军医院已将气功用于军事训练，例如，用气功训练士兵在寒冷条件下提高手温，以便他们能在“不带手套”的情况下操作。

国内外气功大师常有颇具神秘色彩的表演，如对整个会场的听众施加影响；在几米外发功使僵卧的病人手舞足蹈；气功麻醉进行大手术；发功使物体发生物理变化；发功使身体悬空；辟谷（长期不食）等等，这些绝非是天方夜谭式的传奇，而是已知和未知的生命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人们已经尝试用现代科学的精确目光和手段对气功进行研究和描述。1974年，国际著名化学家兼物理学家，英国的鲁克斯爵士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气功的作用原理，197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约瑟夫森和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雷高金等国际著名科学家也参加了气功的研究和讨论。英国爱尔兰邓星克天文台副台长江涛教授，对中国《自然杂志》1978年5月创刊号上发表的《探测气功运气疗法物质基础的初步实验结果》一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些发现具有先驱者工作性质”，“是一项创见性的成果”。美国的科学家陈德仁提出：要同中国的气功医师协作，用科学手段对气功疗法进行研究。

林厚省教授指出：气功锻炼能确实有效地发挥人体内在的潜能，同时还起着自我控制的作用。从现代生物控制论的观点来看，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而大脑是这个系统的调控中心。现在，人们对这种自我控制不断有了新的认识。这个自我控制系统的主要部分是某种性质的信号（介质）和细胞结构以及它们的互相作用。细胞与细胞间通过介质的释放和接收来传递信息。练功中的“调身”、“调心”、“调息”都是自我控制。练功后，血浆环磷腺苷含量增高，传递信息的介质增加了。而且，练功又可使一些介质，如5—羟色胺比正常人升高23倍。这些介质对机体细胞具有整合作用和有序化，因而能够治疗那些由于细胞间“通讯”误差所引起的疾病。有人把这一疗法称之为自我控制或自我训练疗法。现已证明：通过气功锻炼，可以控制自己的心率、血压、肌电、脑电等方面的内部机能活动。70年代初，英国物理学、心理学家E·格林，曾对气功师斯瓦米作实验观察，发现这位气功师能用意念控制手的温度。10分钟内，使同一手掌拇指与小指侧的皮肤温度相差12摄氏度，他还能用意念改变心率，从每分钟70次变为每分钟300次。1960年，美国医生玛丽纳亚和霍兰德在治疗中风和外周神经损伤的患者时发现：如果将患者有关功能受损组织的肌电图，变成视觉和听觉能够接受的信号，作用于患者自身，通过患者的意识活动，病性能较快地好转。1964年安德纽斯医生用同样的方法，观察70例半身不遂的患者，也获得了同样的效果。这一结果引起美国、加拿大医学界的重视。从1969年起，他们研制一系列电子监测仪器，如皮肤电阻回授计、血压回授计、皮肤回授计、肌电回授计等等。病人练功时，因体内或体表状态改变而产生的“信息”，能够通过这些仪器反馈于病人自身，控制练功的时间和强度，纠正其偏差，引导入静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回授法”。这实际上是利用现代仪器帮助病人练气功。据加拿大的格门士和布朗士报道，他们用这种方法治疗200名病人，结果60%症状消失，32%好转，无效者8%。美国的布勒德礼等用这种方法治疗114例，结果大多数在812周后逐渐好转。这些患者，都是经过长期常规治疗无效的。正是由于其明显的效果，致使这种治疗方法得以迅速发展。1970年，美国成立了“生物回授学会”，会员超过1000人。1974年又创办了会刊，并逐年出版年鉴。

(三) 国际气功研究组织和国外研究机构

由于中国气功中国外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建立有关的研究机构，并出现了国际性的气功研究组织。自 1973 年以来，国际气功学术会议曾分别在意大利的罗马、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摩纳哥、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圣地亚哥海军医院、斯坦福研究院，英国的伦敦大学、伦敦布尔比克学院，都开展了对气功的研究，出版了一些刊物和专著。

1978 年，瑞士玛赫瑞希研究大学举行了数十次学术讨论会，还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综合研究计划，邀请世界各国科学家前往共同研究。在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建立了气功学术团体，培养了 200 多万人。

1983 年 7 月，以赫伯特·本森为团长的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气功考察团一行 7 人，在卫生部顾问马海德教授的陪同下，到中国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访问考察并进行学术交流。已故的原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院长、气功主任医师、我国现代著名气功专家刘贵珍等介绍了中国气功的发展简史、概况、气功的临床应用。赫伯特·本森团长介绍了美国有关研究情况，交流的内容都引起了对方的很大兴趣。

1958 年，在上海气功研究所召开了中外气功研讨会。1986 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医药国际会议，其中有中国气功的专题会议。

1987 年 5 月，首届国际气功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及美国、日本、加拿大、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新西兰等国家共 180 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们对气功在医疗、体育、保健等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以及气功的发展和科研进行了学术讨论，会议期间进行了精彩的功法表演。会议结束时，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气功体育研究会。

1988 年 3 月，国际气功联合会在新加坡成立。当时，新加坡自然疗法学院举行了“太极气功与武当气功学术交流会”。来自中国上海、台北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瑞士、阿根廷、前联邦德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医学家、气功学家、武术学家 400 余人参加大会。裴锡荣先生在会上宣读了《武当气功与太极拳之关系》的论文，交流了武当功法，受到了各国代表的欢迎。中国作为全世界公认的气功发源地，各国都马首是瞻。交流会期间，新加坡、中国等代表提出筹建“国际气功联合会”，以团结全世界气功界，为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瑰宝和为气功科研作贡献的建议获得一致通过。于是，国际气功联合会于 3 月 15 日在新加坡正式成立。临时会址设在新加坡自然疗法学院内。会议函请钱学森、张震寰二位担任“国际气功联合会”领导人。

由于中国气功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成立了许多研究会、学会。如日本的日本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学会、全日本中国气功协会、日本中国气功医疗中心、关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快会、名古屋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协会、日本热海中国太极气功十八式协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都成立了中国太极气功十八式协会；澳大利亚成立了中国气功协会；美国有三藩市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协会、美国西部气功科学研究协会、美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协会；加拿大成立了中国气功强身社，英国成立了中国

气功科学研究会；法国、瑞典、比利时、荷兰也成立了中国气功协会；巴西成立了中国气功健身馆等等。显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气功已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同时，印度瑜珈术也在世界上传播，成为中国气功的竞争对手。

世界针灸联合筹委会执行主席、著名中医专家鲁之俊认为，中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对气功科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人才培养、科研、医疗等方面切实做一些工作，能适应国内外气功热的需要。他认为必须充分利用一切现代科学手段，邀集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一起来解释八卦、易经等；请声、光、电各方面的专家研制用于气功测试、分析用的仪器，以揭示有关生命科学的气功本质。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在研究人体科学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气功科学的研究。”“气功，系统医学和人体特异功能一理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就可能发展为一门新的科学，将会使现代科学再提高一步，并导致爆发一次科学革命，一次东方的科学革命”。一些科学家认为，中国气功可望成为癌症的克星，而且可能成为对付艾滋病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可以治愈某些非感染性疾病，而且对病菌病毒引起的疾病也有疗效；不仅可以治愈某些不治之症，而且在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等领域可以大显身手。在国内外气功爱好者、研究者、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古老的中国气功一定会大放异彩，得到发扬光大，造福于人类。

